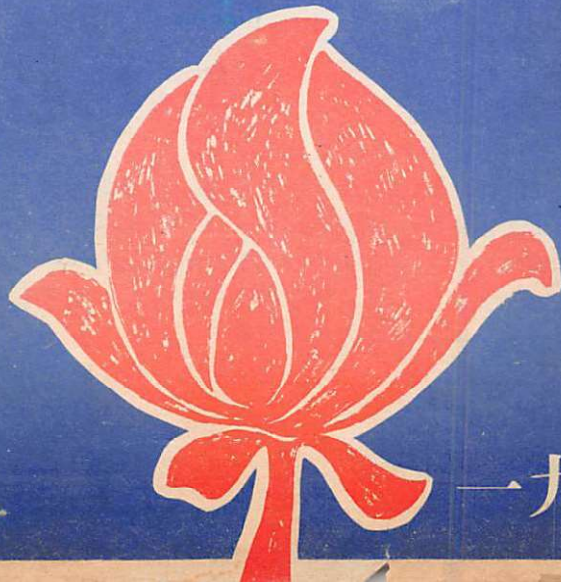


C H I N A S P R I N G

中国之春

創刊號



US\$1.00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發刊詞

現在，經過國內外民主戰士的共同努力，中國當代民主運動新的喉舌——《中國之春》終於問世了。

我們這一代人，曾經在喪失理性的年代裡狂熱過，也曾在「傷痕」累累，萬馬齊喑的歲月中痛苦過、呻吟過、迷惘過……

從李一哲大字報到天安門「四·五」運動；從西單民主牆到各地大學生選舉風潮，經過這場被譽為「北京之春」的中國民主潮流的猛烈沖擊，終於使我們看見了，一個革命專政政權背後的封建醜惡面目；從迷惘中，我們終於覺醒到「共產主義是天堂」的鼓吹者，正是自毀那通往「天堂」的道路的破壞者。然而，我們這一代人有能力擺脫過去可怕的惡夢，有勇氣面對現在艱苦的鬥爭，也有信心開拓未來嶄新的大道。我們要反省、解剖自己的理性世界。我們要詰問、評判現存的價值體系。《中國之春》正是我們這一代人逐步成熟的標誌。

《中國之春》國內外編輯們都是當年「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在那場運動中，大家認識到辦一個全國性、以探討理論和團結同志為目的的刊物的必要性。於是，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會刊《責任》，於一九八〇年九月誕生了。不幸，她很快就被扼殺在搖籃之中，民運先鋒們一一被捕入獄，整個運動也被迫轉入地下。但是，「只要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大家反而更冷靜地坐下來，看書學習，不斷地積攢着自己的力量。其中一部份人來到海外，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和籌備，在愛國僑胞的支持下，開始繼續進行《責任》未完成的事業。

《中國之春》是「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和昇華。她將繼續承和發揚那場運動反封建專制、反官僚特權；爭民主法治、爭自由人權的光榮傳統，擔負起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歷史任務。

作為一個新的中國問題論壇，《中國之春》要對中國現在的制度及其意識形態，進行揭露和批判，也要對中國社會的過去和未來的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同時，還要介紹當代社會科學學說和人文思想，世界各國政、經制度的特點，以及各國人民在爭取自己國家的政治民主的鬥爭中所取得的經驗，為改造中國社會積累更豐富的思想理論財富。

作為一條溝通中國大陸人民與海外僑胞及外國友人之間的渠道，《中國之春》一方面要對國內的重大事件作及時的分析、報導和評論；另一方面，要向大陸人民傳達海外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和聲援。

我們希望國內一切願為自由、民主而鬥爭的人士，通過各種途徑把消息、報導、評論和著作等稿件轉寄給編輯部，同時也盼望各界朋友協助這一工作。《中國之春》歡迎一切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踴躍投稿。

《中國之春》是在中國民主自由這棵希望之樹的幼苗被邪惡勢力砍倒之後，從伸延出來的根上，生長出來的一棵新的枝芽。她的根深深扎在國內，能夠直接吸收祖國大地的營養；她的枝葉放展於國外，能夠沐浴更多的自由與民主的陽光。

我們堅信，通過覺醒了的一代人的堅韌不拔的努力，滿園春色的時節必將到來。讓我們一步一個腳印，去迎接祖國的春天吧！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總第一期

目 錄

發刊詞 本刊編輯部.....

闡述《中國之春》創刊過程，辦刊宗旨及奮鬥目標。
指出國內民運雖遭到鎮壓，但民運並未倒下去。
《中國之春》為新興起的中國民主運動的喉舌，為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而吶喊。

告海內外同胞書 本刊編輯部.....

簡述了當今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形勢，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分析其基本原因是缺乏民主與法治。《告同胞書》也淺析了台灣問題，中國統一問題、香港回歸問題及海外華僑思鄉而懼還等問題。指出，解決這一切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真正實現民主與法治。《告同胞書》號召國內人民與青年、出國留學生及海外僑胞團結起來，為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而共同奮鬥。

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回顧與反省.....

《中國之春》編輯部座談會記要... 黃立、王驚蟄整理.....

大家認為，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大致分為五個階段：
一、李一哲大字報（一九七四年）；二、天安門「四五」運動（一九七六年）；三、西單民主牆及民辦刊物（一九七八年）；四、大學生選舉風潮（一九八〇年）；五、《中國之運》的籌備（一九八二年）。前四個階段可稱為自發民主運動時期。編輯部成員回顧了每一階段運動的產生背景，表現形式與其意義。重點放在檢討每段運動的教訓上。編輯們認為，《中國之春》這一刊物的出現，標誌着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已步入自覺階段。

中共的經濟調整決策行得通嗎？ 國內編輯關微宏 18

通過對中共十二大前後經濟政策的比較以及對國內經濟建設實際情況的分析，作者導出的結論是，中共經濟調整的戰略決策將以失敗告終。

評胡耀邦總書記對法國議長的談話 國內編輯劉燕 26

作者比較了胡耀邦、華國鋒對審判四人幫一案的講話
◦ 指出，現中共領導人胡耀邦等，仍無任何法治觀念
◦ 今日之中國大陸、人治、黨治凌駕于法治之上。

爲了祖國的春天 — 棄醫從運宣言 王炳章 29

名譽編輯簡介 本刊資料室 35

《中國之春》編輯部第一號決議 本刊編輯部 36

決定授與魏京生、王希哲等十八名被捕，甚至尚在獄中的民運先鋒與民刊創辦者爲名譽編輯。決定李林爲《中國之春》主編，黃立爲執行主編。編輯部十二人組成，六人爲國內編輯，六人爲中國留學生。

編者的話

《中國之春》創刊號終於出現在讀者的面前了，雖然這個刊物在我們心中醞釀已久，但當我們投入工作時，卻發現我們在海外創辦一個刊物的實際工作經驗實在太少，雖然我們得到一些熱心朋友的協助，我們仍然覺得這個創刊號比我們預期要達到的水準還相差太遠，這只能怪我們的經驗不夠和人力不足。

當《中國之春》即將出版的消息傳出以後，我們得到超出預期的熱烈反應，而我們實際工作的進展卻並不如我們預期的那麼順利，但爲了不辜負各方面熱烈的期待，我們還是決定把這個還並不十分成熟的成品呈現出來，一方面作爲民運刊物由國內轉到國外的一次試刊，另一方面也希望與讀者共同檢討，以提高《中國之春》的水準，希望讀者多多來信提供寶貴意見。

這期的主要內容是把《中國之春》的宗旨和精神呈現給廣大讀者，把《中國之春》希望達到的目標昭告全世界關心中國前途的人，讓我們攜手共同爲中國光明的前程邁出第一步。

告海內外同胞書

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先驅者們曾經渴望創辦的民運刊物——《中國之春》，終於克服重重困難，和海內外同胞見面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中國的民主運動並沒有倒下去，她以更加成熟的姿態重現中國和世界的政治舞台。

在我們國家和民族處於歷史轉折的關頭，《中國之春》毅然舉起反封建專制，反官僚特權的旗幟，為在神州大地實現真正的民主與法治，自由與人權鳴鑼吶喊。

親愛的同胞們，我們在此不願再翻閱那滿篇都是國恥國難和賣國條約的中國近代苦難史了。為中華民族開創一頁新的光榮歷史，我們更關注的是國家和民族的現實狀況。

首先，讓我們看看祖國大陸吧。中國共產黨接管政權已有三十年的歷史了。政治上，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專政。一方面，官僚特權階級內部的權力爭奪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催殘國家和民族的政治運動連續不斷。體制上，是一小撮黨官僚凌駕於政、軍、法、民之上的一元化統治和密如蛛網式的層層控制。思想上，是各種強制性的「主義」教育和永不休止的自我

改造。經濟上，是違反客觀規律的盲目指揮和畫餅充飢式的空想藍圖。結果，百業俱廢，國力凋敝；「三信」危機，空前嚴重。

不錯，「四人幫」垮台之後，我們曾和海內外同胞一樣，寄希望於新的當權者。然而，那些所謂的黨內「改革派」，利用了人民對民主的渴求，達到他們排除異己的奪權目的，隨即對「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實行殘酷鎮壓，對關心國是，苦諫良言的魏京生、王希哲等民運先鋒進行法西斯的迫害。中共「十二大」之後的局勢，更加令人失望。大會除產生了一個由六人偶數組成的，比任何一屆都更為老朽的中央常委會和照顧老官僚的面子，願而不問的顧問委員會之外，別無新鮮之處。新的高層領導仍然忙於權力鬥爭，並即將開始為期三年，名為整黨，實則清洗的運動。在一系列的經濟調整無甚效果之後，却想挺而走險，使現存的經濟體制更加趨向於蘇聯的集權模式。綜觀我們祖國積重難返的困境，看看我們人民貧乏的精神生活的物質生活，我們不禁心如撕裂，黯然淚下。

再讓我們看看台灣社會。國民黨退守

孤島以來，在經濟上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其加工出口型經濟仍存在着種種問題。

在政治上，由於當政者對實行民主沒有誠意，而造成人心離異，由於恐懼權力的丟失，益發限制民主力量的發展。因此在共產黨統戰攻勢下，只有被動地以反攻大陸，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空話苟且敷衍。

我們的祖國還有一個特殊的香港問題。香港是腐敗的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歷史見證，香港前途面臨一九九七的重大抉擇。香港同胞，熱愛祖國，人心思歸。香港回歸，有這麼雄厚的民族基礎，本應不成爲問題。遺憾的是這却成了香港同胞最担心的大事。大多數香港同胞一提起一九九七，便不寒而慄，這難道不足以引起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深思嗎？

最後，當我們談到海外廣大僑胞的問題時，內心更加不能平靜。廣大僑胞，身居異鄉，心向祖國。但他們多少年來，有家不敢歸，思鄉又懼還。想爲國出力的投資者，想歸國貢獻才智的知識份子，大部份仍在觀望和徬徨。我們更知道，許多老華僑想回國安渡晚年，很多人想把子女送回國內學習祖國的文化遺產，可是，這些願望爲什麼不能實現呢？

百餘年來，中華兒女一直追求而追求不到，甚至到今天仍要背景離鄉寄居外國，所要逃避的又是什麼？現在我們必須瞭解，要澈底解決中國的苦難，只有實行民主、法治，只有提倡自由與人權。只要在中國的土地上，有民主、有法治、有自由、有人權，才能談中國的現代化，才能談祖國的統一問題，香港的回歸問題，海外廣大華僑的心願才能真正的落實。

海內外的同胞們啊，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不能再繼續遭受更多的痛苦了！試問諸位，難道中國人民就根本不配享有民主與法治嗎？難道自由、人權僅僅是他國人民得天獨厚所擁有的嗎？難道我們只能留給

自己的子孫後代又一頁中華民族的苦難史嗎？不，決非如此，我們應該用實際行動和最大的努力去鬥爭，去爭取譜寫歷史的新篇章。

國內廣大的青年們，你們佔全國總人口的大多數，中國將來的命運將由你們決定。希望你們繼承「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光榮傳統，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提高鬥爭藝術和理論水平，注意積蓄中堅力量，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同時，也要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採取一切可行的辦法去影響群衆，以加速社會的變革。

正在海外的中國公費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們，你們是各行各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是幸運的中華兒女。你們思維敏銳，憂國憂民，更不乏真知灼見。通過國外學習、進修的親身體驗，你們更加清楚我國的社會弊病所在，也知道國外什麼值得我們學習，什麼值得我們借鑒。我們希望你們在學習期間和回國之前，把你們的心聲和見解用筆名書寫表達出來，寄給《中國之春》，利用這塊民主自由的園地來積累有價值的思想資料，以實際行動，加入這一新興起的民主運動。另一方面，儘管你們踏上祖國大地之日，便是言論自由被剝奪之時，但你們回國之後，將走上重要的崗位，甚而擔任某些領導職務。你們帶回國的，決不僅限於先進的科學技術，重要的是，還有適應我國國情的嶄新的人文思想。我們熱切的希望，你們將合理地利用有限的權力，同封建專制，官僚特權階級作巧妙的鬥爭，積極向廣大民衆宣傳民主與法治的觀念，在盡可能的條件下，實行局部的民主改革，以造福於國家和人民。

留學海外的自費留學生們，你們絕大多數是朝氣蓬勃、富有正義感的熱血青年，是屬於覺醒一代中最寶貴的力量。與公費留學生比，你們較少後顧之憂，並且和海外華僑社會有着更加廣泛和密切的關係。因此，在宣傳中國的民主運動，動員海外廣大愛國僑胞關心和支持這一運動方面，你們有着不可推御的責任。現在，我們

回大陸鬥爭
中國之春
名聲人？

到這去了
調文化，何如
大陸？

提出這等
口號，就
味談笑
嗎？

熱切希望和歡迎你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
成爲《中國之春》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總
有一天，你們將成爲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
火種，燃起一點，照亮一片，終成燎原之
勢。

台灣和香港的廣大青年以及從這兩地
來到海外的留學生們，中國的問題，是我
們大家關心和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的前
途，也就是我們所有炎黃子孫的前途。從
七十年代初期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到
最近在香港召開的聲勢浩大的「九、一八
」集會，我們看到了你們關心國是、尋根
溯源的可貴精神。你們是中國當代民主運
動的支持者和生力軍。我們盼望着你們參
加到這一運動中來，與我們併肩而戰。

海外廣大的僑胞們，孫中山先生當年
曾滿懷激情地贊譽：「華僑是革命之母」
。我們真誠的希望你們發揚熱愛祖國、支
持民主運動的偉大精神。最近，海外同胞
自發組織起來的聲援營救民運先鋒戰士

希哲和何求的鬥爭，極大地鼓舞了國內的
民主運動。我們在此特向你們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深切的謝意。我們希望你們的鬥爭
將和《中國之春》運動配合起來，造成更
大的聲勢和影響，迫使當局按照法律無條
件釋放被捕的民運戰士。我們還衷心地盼
望各界僑胞給予《中國之春》人力、物力
、智力和財力上的支持和援助，爲中國當
代民主運動的發展與壯大，創造更好的條
件。

親愛的同胞們，在中國社會即將有一
個巨大的變動來臨之前，分析研究中國的
具體問題，進行廣泛的宣傳和發動工作，
團結廣大的人民群眾，乃是我們的近期任
務。我們深知「任重而道遠」；在我們前
進的道路上會遇到各種艱難險阻。但是，
（我們願意在通向民主自由的大道上，起到
鋪路架橋的作用。讓我們携起手來，積極
投身於改造中國社會的偉大歷史潮流中去
吧！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中國之春》

《中國之春》訂閱單

姓名：英文

NAME

中文

零售：每本 \$2.50

地址：ADRESS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12.00

學生訂戶：\$9.00

贊助訂戶：\$30.00 以上

學校機構：\$30.00

支票請寄：CHINA SPRING

（美國）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加拿大）

P. O. 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2B 3K3

《中國之春》 編輯部座談會記要

《編者按》：《中國之春》編輯部籌備小組部份成員，於八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舉行了數次座談會。座談會上，大家結合自己親身的體驗，對前一階段中國民主運動進行了很認真的回顧及冷靜的檢討。國內編輯以書面發言參加了討論。現將座談會紀要整理發表。

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 回顧與反省

當代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至今已有了八年的歷史。大家一致認為，這八年，可劃分為五個主要階段：李一哲大字報為第一階段（一九七四）；天安門（四五）運動為第二階段（一九七六）；西單民主牆及民辦刊物為第三階段（一九七八）；大學生選舉浪潮為第四階段（一九八〇）；《中國之春》的籌備工作為第五階段（一九八二）。

多數編輯認為，前四個階段可總稱為自發民主運動時期。毫無疑問，兩年之隔的這幾個不同發展階段，都有它們各自所處的歷史背景，各自發生的主客觀原因，各自所表現的形式和含有的內容，以及各自所具有的現實和歷史意義。今天，在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又開始走向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我們稱之為自覺民主運動時期，有必要對過去工作作一番認真的回顧，更重要的，是進行一次冷靜的反省。

第一階段——李一哲大字報

董旭生（《中國之春》國內編輯書面發言）

一九七四年，文化大革命進入批林批孔階段。「四人幫」已意識到毛澤東即將逝世，拼命想在毛澤東的有生之年，鞏固已經獲得的權勢。「四人幫」把矛頭指向了最難對付的政敵——周恩來。一九七四年，是文革發展的第八年。一方面，人民已被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搞得精疲力竭，加上工農業生產的危機及失業大軍的出現，人民怨聲載道，憂國憂民。另一方面，文革的磨練，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嗅覺。批林批孔剛一開鑼登場，群眾就意識到了批周倒周的實質。當時，廣大民衆還把救國救民、收拾殘局的希望放在周恩來等黨內務實派上。由於周恩來的務實作用及在林彪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已成了人們心目中唯一能夠對抗毛澤東及「四人幫」的偶像。「四人幫」批林批孔批

周公的野心的暴露。使人們更堅信了這一信念：保衛周總理，就是保衛中國的希望。

李一哲大字報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以《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為題，出現在廣州街頭。大字報鮮明地向毛澤東、「四人幫」提出質問：你們搞的批林批孔，「究竟想把火往哪裡燒？」與李一哲大字報相配合的，是全國範圍內出現的一股潛在的保周運動。這是對批林批孔運動的直接對抗。

李一哲大字報的出現，還和作者的背景有直接關係。李一哲中主要成員王希哲，是文革初期造「官僚主義」之反的紅衛兵，文革的正面經驗教導了這批紅衛兵「造反有理」，使他們嘗到了「大民主」的滋味，並訓練了這批青年人串聯、編輯及寫作的才能。

李一哲大字報從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引經據典，以表達作者的思想，以文革最初級的鬥爭形式——大字報來喊出他們的心聲。不同的是，以前的大字報都是批毛澤東之所批，而李一哲的大字報，則批判了毛澤東所維護的利益。

李一哲大字報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文革初期億萬人民群眾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文革合理內核的發展與繼續。與文革初期不同，李一哲大字報是紅衛兵對自己造反行為的反省和總結，是與毛澤東、林彪、「四人幫」御用文革的公開決裂。如果說，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給中國當代民

主運動打了群眾基礎及造就了一批人才的話，李一哲大字報則可視為是老一代紅衛兵開始覺醒的重要標誌。

今天，當我們冷靜回顧一九七四年李一哲大字報，以及伴隨的保周運動時，我們認識到，保周運動本身仍然帶有對毛澤東的個人幻想，人們仍然在用毛澤東的聖旨「反周必亂」做為精神安慰和保周的武器。至於李一哲大字報本身，仍然具有極大的理論上的偏狹性，並且遠遠沒有跳出馬列主義的教條。它只是一種自發的民主思潮的萌芽。當然，組織上的私交性及區域性，也限制了大字報的影響範圍。

第二階段——「四五」運動

武煒（中國留學生，《北京之春》國外編輯）

我是天安門「四五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下面我談談四五運動，主要是總結教訓。

從李一哲大字報到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這二年期間，中國政治舞台上發生了更為深刻的演變。毛澤東終於看清了周恩來提拔起來的鄧小平之真實面目。他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終於把鄧小平再次逐出政治舞台。毛澤東以「四人幫」護駕，準備傳位於他的親侄毛遠新，並做了一系列的具體準備。周恩來的病重、逝世，鄧小平的失勢，使人民寄希望於黨內務實派的幻想徹底破滅了。經濟上，周恩來一九七五年五月再次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計劃，遭到「四人幫」的全面批判，冠之以「唯生產力論」。鄧小平短短上台而稍有轉機的生計秩序又重新陷於一片混亂。人民對毛澤東、「四人幫」法西斯式的專政，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人民甚至沒有了生存的出路。多數人民已經完全絕望了。但是，以經歷過急風般的文革鍛鍊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中的一批「精英分子」，他們思路廣闊和勇於探索。他們此時雖然也心急如焚地憂國憂民，但同時他們也積極地和不懈地去進行思考和探索方面的努力。

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怎樣？中國的

最高掌權者們究竟要把中國引向何處去？這不僅是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而且對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來說也是最急需回答和解決的根本問題。

果然，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四月份，北京人民的怒潮終於以官方壓制人民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為導火索而爆發了。

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人流，自動地匯集在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下，以花圈、輓聯、詩詞及臨時搭起的講台為武器，與封建法西斯專制展開了一場以死人壓活人，驚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鬥。

在無數的詩詞中，最具代表性的詞句是：「秦始皇式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人民已不是愚不可及」，「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

在大海般的怒濤中，人民特別要求懲辦禍國殃民的慈禧太后般的「四人幫」。

在強烈的求生要求中，最注目的是要求鄧小平重新當政並實現四個現代化。

類似「四五」運動的事件在上海、南京、鄭州及全國各地均有發生。

「四五」運動是中國，恐怕也是世界有史以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場自發的群眾對執政黨的封建專制制度的示威運動。是對毛澤東發動的，以打倒與已、保住皇位為目的的，（御用文革）內含的徹底否

定（注：武焯認為，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文革運動是一個政治混合體，由三部份組成：一是破舊立新、繼續革命的華麗外壳；二是毛澤東個人野心的內含；三是人民群眾反對官僚主義的合理內核。有關此問題，以後再予以研討。「四五」運動也是一次公開的民意測驗，是載水之舟可以覆舟的一次實踐。人民用輓聯、詩詞投了毛澤東、「四人幫」的反對票，投了周恩來、鄧小平的信任票。「四五」運動是後來促成華國鋒宮廷政變的重要政治背景，和強大的社會的支持力量。

後來，作為親身參與者，和我很多老戰友們多次反省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上百萬人的示威運動，竟然被「四人幫」一舉擊潰了呢？我們從中可以汲取什麼教訓呢？我們認為下述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一、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仍屬於自發性的感情性的反抗。當時，還沒有產生一個有威望的，由領導人物構成的核心，以及由這一核心所指導的分層領導系統，因而，運動缺乏强有力的統一領導和計劃。後來出現的《首都悼念周總理統一行動委員會》，組織過於倉促和鬆散，缺乏權威性。

二、當時，群眾雖然學會了打着紅旗反紅旗，即以悼念周恩來為名，打倒「四

人幫」為實的鬥爭方式，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內的某個人身上，如寄托在鄧小平一類受害者身上。而望不到或不相信人民群眾自身所能產生出來的那種强大到足以推動整個歷史前進的力量。大多數人仍然相信這樣一種推導：鄧小平是毛澤東、「四人幫」的對立派，毛澤東、「四人幫」是壞的，所以鄧小平應該是好的。很少人對產生毛澤東、「四人幫」的制度本身產生懷疑。所以打出「擁護真正馬列主義」的旗號。再退一步講，如果當時群眾有一個廣大人民群眾信任和支持以後組織嚴密的領導集團，而且與鄧小平取得配合的話，頂好的情況會像伊朗一樣，把國王（毛、「四人幫」）趕走，把霍梅尼（鄧小平）捧上台去。結果必然是換湯不換藥。所以，今天，當我們回顧當時的革命風潮時，雖然人人都激情滿懷，但都表示，如果知道了鄧小平今日之所作所為，就不會為他的復出而不惜生命了。

三、導致第二種教訓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對專制制度、官僚特權階級的產生及形成，進行深入的理論上的分析。也就是說，沒有尋求或探討一種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能接受和相信的理論來指導這場運動，其結果當然是跳不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教條主義老框框，因而又就必然使多數人不能衝破現代迷信的禁區以及寄希望



1976年清明節攝於天安門廣場

於執政黨內的所謂「開明的能人」了。如當時，詩詞萬千，竟沒有一份像樣的理論性大字報出現。這不能不視為是一種比較醜陋、也是比較原始的鬥爭方式。要知道，憤怒可以產生衝動，而衝動並不等於革命。這是「四五」運動給我們留下的重要的教訓。

四、對毛澤東個人評價，在當時還有極大的局限性，據我所知，大部份人主張「三七」開，即並不願意摧毀這尊神像。這種心理仍是幾千年來封建傳統對中國國民根性影響的反映，也是如前所講是缺乏一種正確的理論去指導這場運動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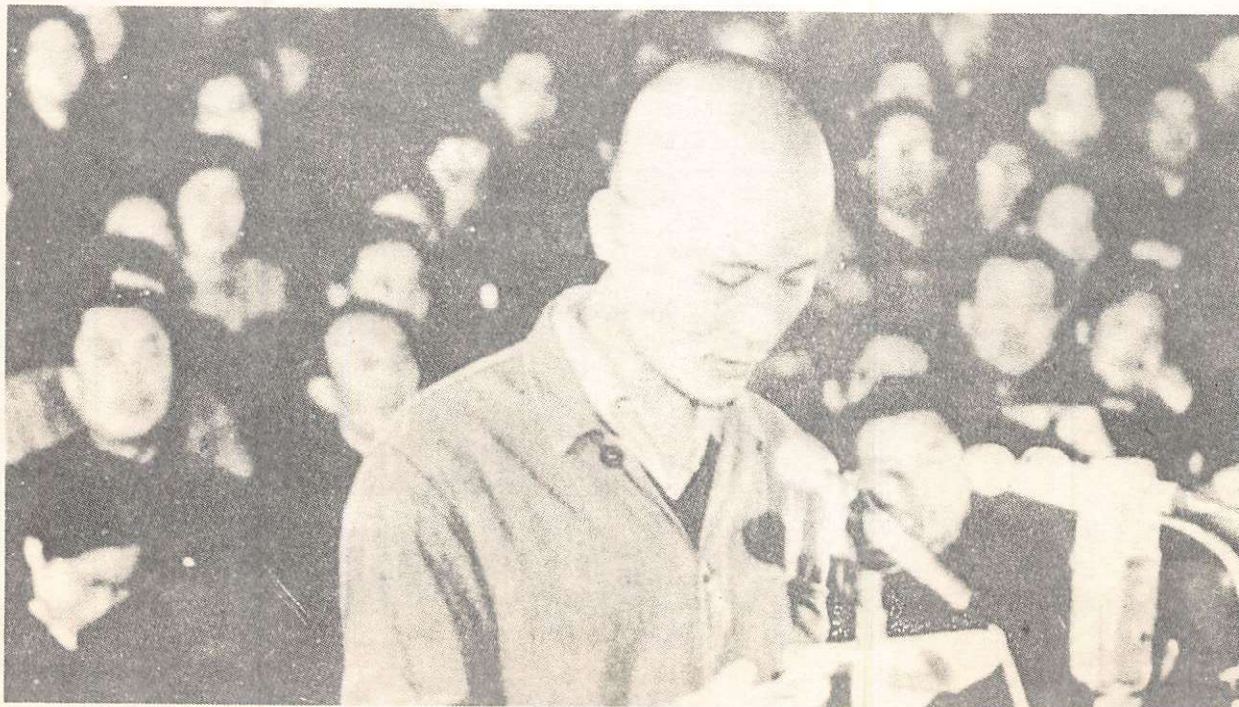
第三階段——西單民主牆及民辦刊物

李林（中國留學生，《中國之春》主編）

一九七九年初，我在北京和許多民辦刊物的編輯有過接觸，我來淺評一下這一運動。一九七八年底，在北京西單出現的民主牆和隨後出版的民辦刊物，統稱為《北京之春》。《北京之春》是較早出現的一份民刊。由「四五」運動的英雄韓志雄（後選為共青團協中央委員）、王軍濤（後選為共青團協中央後補委員、北大學生選舉風潮積極參與者）等創辦的。記得，在他們張貼《北京之春》時，我還詳細地向他們詢問了有關彭真從陝西回到北京的

情況。其實，《北京之春》只出了幾期，在中央向他們打了招呼之後，就自動停刊了。他們的編輯，都沒有被捕。但是，用《北京之春》響亮的名字和深刻的寓意，却代表着新的一代的覺醒和人民的心聲，並閃爍着「四五」一代思想的火花。因而被用以概括那一時期的民主運動。

對於《北京之春》運動的海外評論，至今仍在繼續。我同意下述的看法，即民主牆出現的直接觸發因素是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四五」運動的英雄們要求平反更



魏京生受審時坦坦地宣讀自辯書

北京之春

THE SPRING OF PEKING

79 7

1979. 8. 10.

目 录

一九七九 第七期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从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道统 高登民 1

符权原稿 国朝守日 (题诗) 启 明 8

对法律的严肃考察 本刊编辑部 9

长白往鞍山, 水天总住焉 10

——一个工人的遭遇 毛 色 11

武汉警察殴打他杀工人 吴 斌 12

公安局设在员工宿舍楼 14

在1110 案件的背后 秋 电 15

20世纪的巴士底狱——东成一号监狱 (转载) 金 生 17

晚 间 (小说) 康 丙 21

一点补充 (文艺评论) 宫 民 29

干预生活是作家的神圣职责 一个文艺爱好者 33

注册申请 编辑部 49

本刊通邮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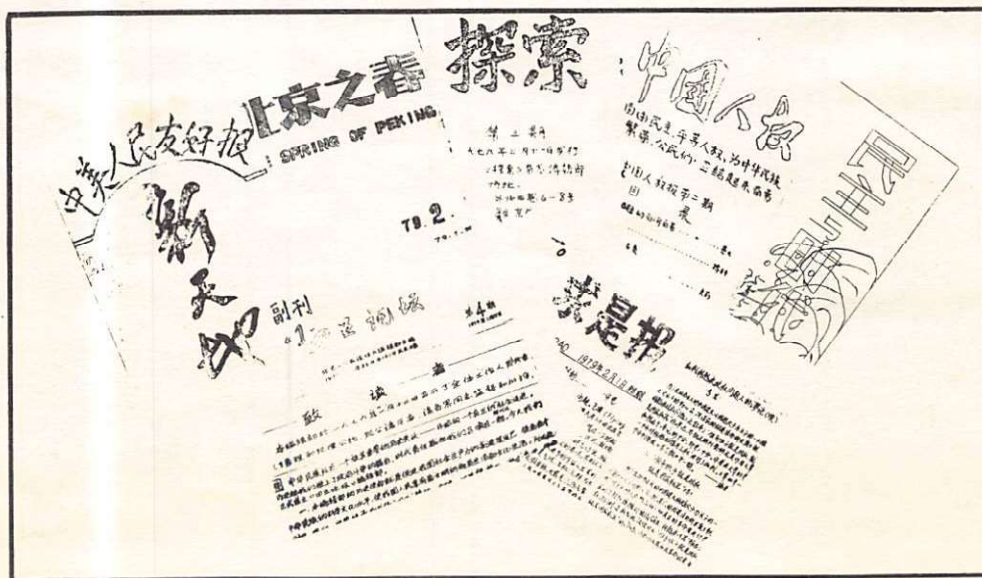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羽楼105号 《北京之春》编辑部

本期定价 0.30元

為徹底，並且懲辦除「四人幫」之外大大小小的罪犯。當時，北京還有一個特殊的歷史現象，就是北京集聚了大批上訪的文革中受迫害的群眾。他們要求為一切冤案平反。他們缺衣少食，在京無依無靠，強烈的要求有一個做人的基本權利，這與後來民主牆提出人權問題有關。上訪運動與要求懲辦鎮壓「四五」罪犯的運動自然交織在一起。在黨得他們的要求必須向社會公開表達的時候，大字報就成了最合法、最有力的工具了。

我們也基本同意這樣一種分析，即西單民主牆的出現與發展，與當時黨內剛剛復出的鄧小平，擴張其勢力和打倒其強大的反對派（凡是派）勢力的需要，直接相關。鄧小平、彭真等極需權力膨脹的人物，是毛澤東領導的文革的受害者，本身就是極大的冤案。因而，「同病相憐」他們不害怕其他受害者起來控訴，相反，他們必須利用人民的控訴向那些文革的受益者施加壓力。奪取權力。這就是為什麼在一九七八年底，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記者時，表示支持民主牆大字報的原因。

西單民主牆早期的形式是沿用文革的大字報。後來，民刊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突破性進展。它的產生說明：一、人們不但要求言論自由，而且也開始要求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罷工和示威遊行自由等；二、人們要求把信息傳播給更廣大的群眾，教育群眾和組織群眾



的願望；三、刊物本身就代表一個固定的組織形式；四、人們也意識到保存歷史資料的重要性，刊物更容易做為歷史資料保存下來，供以後借鑒，來總結反省以往的經驗教訓；五、刊物的創辦者已注意到刊物流傳到海外的重要性。刊物傳到海外，可造成國際影響及國際支持。所以，西單民主牆及民辦刊物在鬥爭形式上較「四五」運動有了顯著的發展。做為鬥爭的輔助形式，民刊的創辦者們還在西單民主牆下舉行過辯論會及非正式的記者招待會。這些，都是鬥爭藝術的提高。

在組織上，《北京之春》運動通過民辦刊物形成了多個以主編為中心，編委為骨幹的中堅集團。

在思想上，民刊發表了一些較有水平的，從理論上探討中國前途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到，西單民主牆及民辦刊物想出了下列幾個重要的理論性問題：一、民主政治與四個現代化的關係，實際上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問題；二、提及官僚特權階級的概念。把鄧小平等新舊官僚放在一起進行分析；三、對當代中國社會制度的剖析，提出了中國實際上為封建社會主義及農業社會主義的看法；四、首次提出了天賦人權的要求，指出了人權問題在中國的嚴重性。五、民刊敢講執政黨之所不敢講的真話，敢寫一般人不敢寫的心裡事，旗幟鮮明地去無情揭露以往三十年來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冤、假、錯案，仗義執言，不畏權貴地擔當了為民伸冤，為民請命的喉舌的角色。可以說中國當今存在的主要社會問題，民刊都有多多少少的涉及。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驟。所以，民主牆及民辦刊物正式打響了改造中國當代社會及現存社會制度的第一炮。

我和我的很多朋友，是當年民主牆及民刊運動的積極擁護者及參與者。出國之前，我們就意識到有深刻檢討《北京之春》運動之必要。我們認為，雖然《北京之春》運動已經提高到一個理論探討的盡頭，但當時，這些理論問題的探討大多還停留在直接感性認識的階段。對於某些重大理論性問題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還缺乏分析。對中國國民性的分析，尚屬剛剛開始。當然，我們無權責怪當時的民運先鋒



← 這張西單民主牆的照片，會永遠成為歷史陳迹麼？



→ 遊人稀少的月壇公園



↑ 熱鬧的西單牆

↓ 冷落的月壇牆



們，他們太忙了，很少有時間坐下來冷靜地思考問題。他們參考資料太貧乏了，參閱不到外界人文學科的新的學術思想和觀點。同時，由於環境所迫和鬥爭的需要，他們不得不考慮自身的處境來說話辦事，以便既積極地鬥爭，又不能太觸怒當權者們，同時還得保全自己。

在理論分析上，很多文章仍然以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辭句為依據，用馬列的一些只言片語，去打倒毛澤東及鄧小平的一些思想，顯得幼稚及軟弱。在政治上，雖然後來成立了民刊協會，但組織似嫌過晚和過於鬆散。就領導人而言，有輪流坐壓的思想。民刊運動還有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是警覺性不高，保密觀念不强。這

個警覺性包括對某些外國新聞記者的警覺性。由於保密觀念不强，很多會議及行動都被公安局事先掌握情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損失。最後，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民主牆及民辦刊物運動的先鋒份子，大部份是曾經插隊、下放，後來進城的青年工人，與社會基層有廣泛的聯系。然而，這一運動並沒有從社會及時導向學校，而學校是學生聚集而最具爆炸性的地方。而且，高等學府也是中、高級知識份子雲集，即產生高級智囊之處。可惜，很多民刊的先鋒份子未來得及與他們聯合就被捕了。這或這是《北京之春》運動採用比較初級的鬥爭形式及理論上相對膚淺的原因之一。

第四階段—大學生選舉風潮

趙小青（《中國之春》國內編輯書面發言）

民主牆的封閉及魏京生等人的被捕，並不意味着民主運動的結束。終於，運動從轟轟烈烈的街頭移向騷動的校園。一批年輕有為新入校的大學生，或本來就是民主牆及民刊運動的參與者與同情者，或受了民主牆思潮的影響，正準備投身到社會改革的實際中去。客觀上，國內經濟改革政策遭受挫折，鄧小平等人想藉此徹底清除他們的政敵「凡是派」。軍事上，越南硬戰之後，也在忙於總結「經驗與教訓」。因此，當權者們顧此不能顧彼，稍微放鬆了對民主運動的注意。他們前一段殘暴的鎮壓行動，也使他們錯誤地估計民運會陷於停頓。這一切都為民主運動轉向新的高潮創造了條件。這次民運高潮的特點是，學生爭取合法權利（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採用合法鬥爭方式，來參與選舉人民代表的競選活動。

大學生選舉風潮最先源於上海，隨後擴展到湖南、貴州，最後移至北京，一浪

高於一浪。當時的客觀條件給這次選舉活動提供了可能性。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國家政治制度作出了初步政策，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從一九八〇年元月一日起，全國各地逐步展開了直接選舉活動。但是，由於多年來地方黨組織嚴重的官僚主義與黨閥作風，與選民的民主要求形成了極為尖銳的對立。

基層黨閥甚至錯誤地認為這次選舉會像過去一樣，上級內定候選人，選民劃勾了事。因此，基層領導對選舉多採取敷衍、消極態度。與此相反，各地高等學校的大部份師生員工却以積極態度投入了選舉活動。尤其是七七屆、七八屆學生，很多在入學前從事過各種社會職業，故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有較清楚的認識，對任命制、終身制積壓了強烈的不滿。當

然，不能否認，相當一部份選民對選舉運動本身的性質和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僅抱着感情上對官僚主義的憎恨參加運動，故有相當的盲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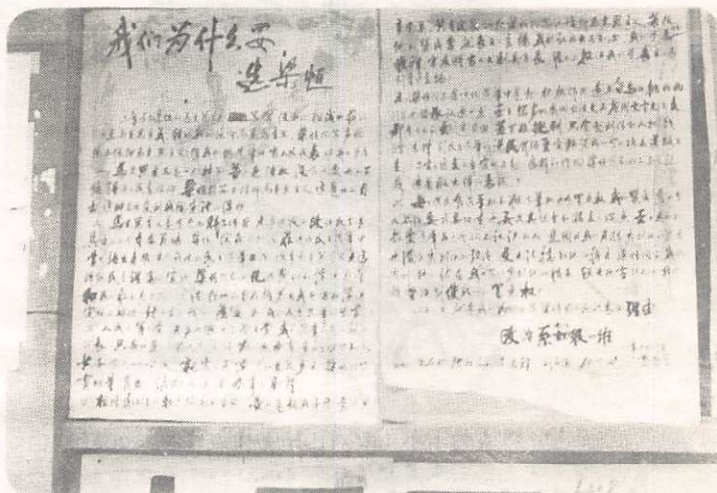
在這種選舉活動中，一個共同的突出特性是，學生自薦為人民代表的候選人。如上海師院的徐政宇，復旦大學的徐邦泰，湖南師院的梁恆、陶森，北京大學的王軍濤、胡平、房志遠、夏申等，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在上海，青年工人傅申奇在所在的工廠採取了同樣的競選方式。學生、工人自薦而通過競選表達參政的意願，這在中國當代史上，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自薦候選人在競選中都提出了個人對改革中國社會的政見或政綱。既有馬列主義派，也有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派，還有自由主義派的觀點。這些自薦候選人，獲得了廣大師生員工的支持，得票數名列前茅。從他們發表的政見看，一致抨擊官僚統治及當權者的政治、思想，並涉及改造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實質問題。在形式上，各院校的選舉運動仍採取文革中「四大」的辦法，特別是在校園中舉行公開答辯——這在《選舉法》中是名文規定允許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鬥爭方式是，各地各校的學生有目的的相互串聯，交流經驗，互相支持和聲援。這是民主運動發展過程中，第一次出現這樣大幅度的聯合意識，並將這一意識付諸於行動。

湖南師範學院的選舉風潮是這場運動中最富有鬥爭性，影響也是最大的。大多數選民對新法律抱有浪漫的、理想化的信任，有「為爭自己神聖的一票，不惜流血犧牲」的壯志豪情。當校方準備把自稱不信仰馬列主義的候選人梁恆拿下來，硬塞一名學生會主席時，激怒的群眾在一次次抗議無效的情況下，把正常的選舉活動轉化為對官僚統治的反抗運動。學生們遊行、示威、請願、罷課，以至進行了絕食鬥爭，最後發展為組成請願團赴京示威，逼迫中央表態，要求罷免學校黨委副書記，選舉領導小組織長蘇明之職。

其後的北京大學選舉活動，與湖南師院猛打猛衝的鬥爭方式不同，則爭取了柔中有鋼、和風細雨式的鬥爭，把選舉運動提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北大自薦候選人，



自稱不信仰馬列主義的候選人梁恆



湖南師範學院的選舉風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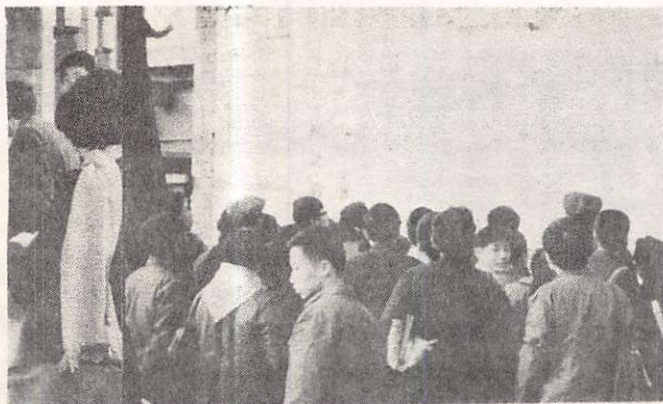


1980年11月17日晚在北大禮堂舉行的胡平演講
答辯會會場。

「我站在這裏，高聲發言……」胡平在
做《言論出版自由》的講演。



「過去的十年，我們已學會懷疑和批判；未來
的十年，我們要學會建設和創造」——在這個橫標
下面是17名競選者對23個問題的答覆。



更重視理論上的探討，發表了不少高水平的競選演說及理論文章，不反對當時，而且對今後的選舉活動都具有相當的指導意義。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北大的鬥爭方式也有特殊參考價值，在中共下令鎮壓選舉活動之後，北大選舉活動的先鋒份子，並未遭到逮捕。這無疑與他們有利有弊的鬥爭策略及巧妙地與官僚當局進行周旋的鬥爭藝術是分不開的。

當然，這次轟轟烈烈的選舉運動被官僚特權階級扼殺了。很多運動的領導者遭到迫害、甚至被捕下獄。當權者對北大學運領袖則爭取了特殊的「冷處理」方式，實際上限制了他們的行動自由。

但是，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學生選舉運動，影響是深遠的，意義是偉大的。首先，這次選舉風潮使民主運動上升到了一個法律的層次，即在現存法律的範圍內，同官僚特權進行鬥爭，也就是所謂「合法化」鬥爭，這種形式與波蘭「團結工會」的鬥爭經驗，有某些相似之處。其次，這次運動是青年政治家通過合法選舉進入國家基層政權的一次嘗試。可以設想，如果將來這種普選可擴大升級到地區、省市一級的話，人民便可通過這種民主的方式獲取更多的權力。

通過這次運動，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黨官僚統治下的法律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虛偽性。當人民利用他們制定的法律進行合法鬥爭而威脅到他們的地位時，黨官僚們就會撕毀一切法律條文，仍以暴力和恐怖維持他們的秩序。所以，鑽其法律的子進行鬥爭，雖然是一種極為重要的鬥爭方式，但不能抱有天真的幻想和寄予過高的期望。我們也清醒到意識到，這次選舉風潮在實質上仍然是自發民主運動的一種形式，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可能再次成為改革社會的先鋒，但其本身在政治上尚不太成熟。

第五階段——《中國之春》的籌備

王驚蛰（中國留學生，《中國之春》編輯）

我們已經看到，當國內民主潮流風起雲湧，威脅到整個專制制度及特權階級時，當權者爲了切身的利益，是不能容忍的。他們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是逐步升級的，也有點像五七年反右時引蛇出洞的味道。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下令逮捕魏京生。一九八〇年一月，鄧小平下令取消四大。既使是在這種恐怖的情況下，一九八〇年十月，中華全國民主聯誼會宣告成立，並出版「責任」雙月刊。與當時正在興起的大學生及地方民衆選舉風潮互相呼應，互相配合。可見民主運動是嚇不倒的。大學生選舉風潮的興起，使當權者看到了波蘭《團結工會》的影子，民主的敵人再也僞裝不住了。一九八一年初，中共中央下達「二號」及「九號」文件，下令對一切民運份子實行鎮壓。民運人士及學生領袖包括王希哲、何求、徐文立等，紛紛被捕。民主運動被迫轉入地下。

在民主運動遭到鎮壓的同時，某些秘密的民運先鋒來到國外，並通過各種渠道與國內民運保持經常的聯絡。在國內，大家在運動轉入地下之後，反而有了機會認真讀書，冷靜思考，並對前段運動進行深刻地反省。在國外，我們密切地關注國內動態及國際形勢的發展，努力鑽研西方人文科學的理論與思想。王希哲、何求被捕判刑之後，國外愛國僑胞掀起了廣泛的營救，聲援運動，使我們看到了海外力量的重要。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反省與理論探討，在與國內同志反復磋商之後，我們一致決定利用國外出版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條件，創辦民主運動期待已久的《中國之春》，將國內、國外的力量滙合起來，把中國民主運動提高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我們首先認真回顧了前段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歷程，重點進行了反省與檢討。

我們也認真總結了波蘭工人階級組織《團結工會》的經驗。《團結工會》是在所有共產黨國家中第一個獨立的、全國性的，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組織。它由工人階級多數參加，並獲得了廣大知識份子、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團結工會》是利用合法鬥爭發展和壯大起來的。雖然，

現在它被取締了，但它做爲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將永遠存在，在適當時機，將以新的形式重登政治舞台。我們如果能夠汲取《團結工會》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並結合我國實際國情，我們可以心地預測，新興起的中國民主運動在不久的將來，會比波蘭《團結工會》有一個較好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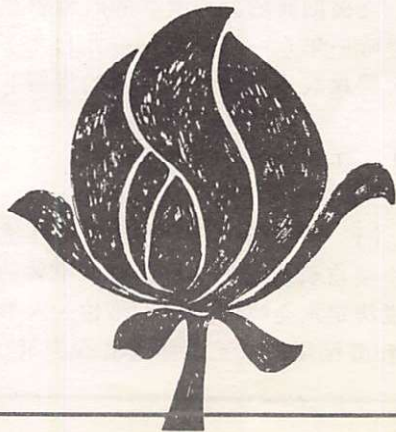
我們研究了中國的特殊國情。注意到中國有大陸、台灣、香港的統一問題，有香港的回歸問題，有海外愛國僑胞的可貴力量。這些，都給下一步運動提供了巨大的力量和寶貴的支持。

我們還研究了當年孫中山先生及周恩來、鄧小平先生在海外進行活動的經驗，結合當今特殊情況，對在海外進行活動的方式進行了探討。

最後，我們仔細研討了中國大陸農業社會主義的實際情況，並對中國國民性及文化傳統問題進行了分析。尤其後一問題一直爲人們長期所忽略，值得深入研究。

總之，我們預測了運動的前途及形勢，採取了必要的預備性措施。我們相信，我們有這麼好的人民，我們有這麼多追求真理的青年，我們有這麼多愛國的海外僑胞，民主事業是必將成功的！中國的未來，屬於這一代覺醒的、富於創造性的青年。

《中國之春》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經過一年多的醞釀準備，與大家見面了。如果說：以往的中國當代民主運動還處於自發的幼年階段，那麼《中國之春》的誕生，象徵着民主運動已步入自覺的青年時期了。



中共的經濟調整決策 行得通嗎？

一、回顧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那場一哄而上的「洋躍進」的迅速破產，給我國經濟學界和我國人民上了一堂不可多得的課：必須全面改革高度中央集權國家官僚經濟體制；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與執行，必須建立在市場機制或市場供求關係的基礎上；必須建立和健全經濟法制以獎懲經濟計劃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必須改革現行的不合理的價格體制，使之能直接反映社會的供求關係和個別企業的效率與整個社會宏觀需求之間的關係，並且能為國家經濟計劃的制定提供準確的信息；國家經濟計劃應該是調節性的和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和強制性的；除某些直接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之外，企業應該而且必須根據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動來決定自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生產多少；企業更新技術，改革管理，提高效率，降低消耗的動力應該是市場機制而不是國家指令性計劃；必須全面改革企業管理體制，建立工人和技術人員直接選舉、任命、監督、撤換管理人員的制度；必須精簡機構，在裁減政治幹部的同時提高技術幹部的地位，使黨權與企業管理權分開，等等。這些問題，不僅為當時的學術界廣泛討論。（註一）而且成為「三中全會」之後開展的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

歷時一年（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左右的我國經濟改革大體採取了下述六個方面的措施：

1、工業企業管理體制

（一）一些省、市（如四川省）挑選了一小批企業進行企業自負盈虧的試驗。參加試驗的企業獲得較大的自主權決定本企業的生產、銷售、人事和分配（工資、獎金和勞保福利）。這些企業的決策在一定程度上，直

接與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掛鉤。企業對國家所承擔的主要任務是上交一定比例的企業利潤。（註二）

（二）許多省、市在相當一部份企業中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參加這種試驗的企業在完成國家規定的生產指標之外可以根據市場需要生產其他產品。如果這些企業超額完成國家生產任務和贏利較多，其利潤留成比例也會隨之增大並且有權決定其留成利潤之使用。（註三）

（三）其餘企業（為全國四十萬工交企業的絕大多數）的管理體制並沒有很大改革，雖然它們的工資制度，特別是獎金制度有所變化。

（四）幾乎所有企業都建立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但是，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是受同級黨組織的直接控制，其職能遠遠沒有達到監督企業領導人的程度。職工代表大會與原來的工會一樣，成了企業領導人控制工人的工具。

（五）絕大部份企業的管理機構沒有被精簡。政治幹部的「決定一切」的統治地位沒有被觸動。技術人員仍處於「被使用」的地位。工人群眾的基本「權利」仍然只是「服從領導」和「努力完成生產指標」的「權利」。企業管理既沒有「民主化」也沒有「技術化」。

2、國家經濟計劃體制

（一）國家計委、建委和中央各部的權利被相對削弱，其計劃範圍相對縮小。與此同時，地方，特別是省、市一級獲得了較大的權力（特別是財權）。省、市一級的經濟計劃指標的地位被提高了。

（二）銀行信貸體制趨向「分權化」，即地方銀行獲得更大的自由向地方政府和企業貸款。

（三）省、市一級獲得更多的自由以影響稅率和一些商品價格的制定。省、市一級還獲得了較大的原、材

、燃料的分配權。

3、價格體制和市場

蘇聯和東歐各國經濟改革的經驗和教訓表明，價格體制的改革是經濟改革的核心。

在我家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的經濟改革中，除了農村自由市場上的農副產品的價格基本上隨供求關係浮動之外，工業產品的價格仍然直接由國家或省、市級政府制定和控制。與匈亞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兩國政府的做法相反，我國的經濟改革並沒有將全部商品分為自由浮動，部份或有限度的浮動和固定價格三大類，而只是讓農村自由市場上農副產品的價格自由浮動。隨後，政府被迫一下子提高八種主要副食品的價格（33%）及其他與之相關的商品的價格。這種做法是接近於波蘭政府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的物價政策的，其結果是導致消費品物價的普遍的、長期的上漲。

4、農業

幾年來，農業中的經濟改革是取得了較大進展的。

(一) 各種類型的生產責任制冲破巨大的阻力（主要來自農村社、縣兩級幹部及其在上面的支持者），在大部份農村地區得到推行。特別是在一些「赤貧」地區，「包產到戶」和「包產到人」的責任制是深受農民歡迎的。（註四）

(二) 在一些較為富裕的地區，如一些大城市的郊區，農民獲得了更多的自留地。

(三) 自由市場在全國城鄉各地廣泛地建立起來。農民可以在完成國家的交售徵購任務之後去自由市場出售其剩餘產品。

上述三條措施的精神實質是：共產黨少「管」或不「管」庄稼漢。這些措施是針對中國農業經濟體制的四大弊病而發的：(1) 生產上農民沒有自主權去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生產多少，甚至什麼時候生產（指什麼時候幹什麼農活）。(2) 分配上農民遭受各級官僚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剝削。(3) 沒有自由市場，農民無法獲得更多的現金來擴大再生產。(4) 農村中的「農奴制式」的人生依附關係，即農村官僚作直接控制農民的一切，直接束縛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5、對外經濟關係



與五十年代相比，我國對外貿易有了二個十分重要的新特點。第一，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已不再是經濟制度與我國相同的蘇聯、東歐各國，而是西方或東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二，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工業以擴大出品，賺取更多外匯和進一步進口西方先進技術和設備也被視作對外貿易的基本方針。因此，改革過去高度集權的外貿體制和建立一些以吸引外資為主要目的的「經濟特區」也就成為勢在必行的措施了。（註五）

（一）地方，特別是省、市一級獲得了很大的權力以及擴大對外貿易。各省、市外貿公司，甚至某些企業獲權直接與外商談判、簽約。新的創匯留成率也成了地方和企業擴大出口的直接動力。

（二）在南方沿海的廣東省和福建省先後開闢了五個經濟特區，其目的有五：（1）吸引外資。（2）增加出口以賺取外匯。（3）學習和吸取外商及港澳商人的經營管理方法。（4）解決部份失業問題。（5）增強我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和擴大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往來。

6、城市失業問題

由於多年來工業生產形勢一直不振作，工業部門擴大再生產和吸收勞動力的能力一直處於萎縮狀態，城市就業問題也隨之日益尖銳。經濟改革在這方面的措施有三：（一）擴大城市服務業。（二）鼓勵發展各體經營戶。（三）允許雇五人以內（在農村中亦有實行）。

一九七九年年初，陳雲就當時我國經濟形勢發表講話，強調計劃工作的重要性並首次提出「經濟調整」的戰略思想。一九七九年年中開始，除了農業，外貿和城市小型服務業中的改革仍在繼續或保持外，工業管理體制和國家經濟體制中的改革逐步為「經濟調整」戰略所取代。其基本原因有：

1 工業管理體制和計劃體制中的改革本身有許多技術上的弱點。例如，整個改革是「言過於行」。其次，試點企業雖然在改革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和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上有所成就，但因為宏觀經濟體制中的某些關鍵領域（如價格體制，原、材、燃料和勞動力分配體制，商業銷售體制以及國民經濟計劃制定和執行的體制，等等）未有很大改動，微觀上的小改小革收效甚微。（註六）再次，經濟改革本身缺乏一個全盤的，經過認真調查研究和分析我國具體國情之後制定的計劃。因此，經濟改革的各項政策和各種措施之間，沒有有機的聯繫與緊密的配合。例如，外貿體制的改革與工業管理體制的改革之間，外貿體制的改革與價格體制的改革之間及工業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價格體制的改革之間沒有一種互相配合協調的關係。

2 任何國家經濟改革的成功都需要具備一定的政治條件。其中特別重要的有四點：（一）黨內或政府內的上層中力主改革與守舊勢力相比佔據優勢。（二）上層改革力量的改革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受到下層人民群眾，特別是中青年知識份子和工人群眾的支持。上、下彼此相聯繫、相呼應。（三）上層的改革力量要獲得中層的一定的支持。（四）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是成功的經濟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在南斯拉夫、匈牙利甚至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的鬥爭中，上述四點清晰可見。

然而，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的我國的經濟改革卻沒有具備上述政治條件。第一，雖然經過「三中全會」改革派在中央站穩了腳並使黨通過了以求全面的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為目的的「三中全會路線」。但是，力主改革的力量在中央遠遠未達多數。與此相反，力主我國回到「文革」之前的「太平盛世」的保守力量（他們也反對「四人幫」）至少在數量上佔上風。第二，除了在內部講話（如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人民日報》和理論界呼籲進行政治改革之外，改革派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動手實施其改革方案，特別是無力解決組織問題。矛盾的焦點被說成是僅僅表現在「老幹部」與「造反幹部」的鬥爭上。但是，「老幹部」這一範疇遠遠不等於「支持改革」。恰恰相反，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僅不支持改革，而且反對（至少是暗中反對）改革。第三，當時經濟工作的領導權並不在改革派手中，而是在所謂「石油派」手中。不言而喻，「大慶精神」是與經濟改革水火不相容的。第四，為了擊敗「新四人幫」，改革派曾經鼓勵和支持「民主牆」和民主運動，並且改革派領導人如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呼籲進行改革的講話，也確實獲得了人民的贊賞與支持。但是，當民主運動要求將改革派



所提出的政治綱領真正付諸實踐的時候，當民主運動有可能發展成爲一支沖擊整個官僚制度的獨立的政治運動的時候，當民主運動在我國青年一代中的政治影響有可能最終取代早已破產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時候，改革派終於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拋棄自己的「立志改革」的旦旦誓言，與保守力量相結合，回過頭來摧殘和鎮壓民主運動。這樣，經濟改革失去了人民群眾中的積極份子的支持。第五，經濟改革雖然給人民帶來了一些「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如增加工資和獎金之類）。但是，因爲經濟管理體制大體上沒有被觸動，特別是掌握實權的仍然是那些政治幹部，而工人群眾和技術人員遠遠不是企業的主人，所以經濟改革的一些措施（如獎金制度和計件工資制）在許多地方就被企業管理人用來作爲他們控制工人的新工具。此外，消費品物價的迅速上升也增強了工人和城市居民的不滿情緒。最後，改革派本身的政治弱點和政治搖擺也是他們逐漸失去最廣泛的群眾支持的一個基本原因。

一個先天不足的改革派只能創造出一場先天不足的改革運動，而一場先天不足的改革運動如果不能發展成一場真正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的話，是注定會夭折的。

二、質疑

根據官方的解釋，經濟調整戰略的出發點是認爲目前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問題是比例失調，即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失調（積累率太高）和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比例失調（用於重工業的投資太多和重工業增長太快）。（註七）經濟調整的目的有三：1 通過調整，使上述兩個比例合理化（例如，積累率應該爲25%左右，輕工業總產值應該超過重工業，等等）。2 通過調整，使生產力各要素得到合理運用，即提高經濟效率。3 通過調整，使生產發展與生活發展相互促進，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戰略角度看，經濟調整被認爲是九十年代將要來臨的我國經濟「起飛」的必要準備。（註八）

經濟調整的具體措施大體如下：1 重新強調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及其指令性質標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2 加強中央的經濟權力，特別是財權。3 加強中央發出的指令性計劃指標對地方以至企業的制約作用。4 加強中央對市場和物價的控制。5 降低積累率。6 增加國家對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減少其對重工業的投資，以加速前兩者的發展。7 加強國家對外貿易的控制。8 停止企業自負贏虧的試驗和控制企業擴大自主權的試驗。9 在重工業部門，大搞「停、關、併、轉」，等等。（註九）

經濟調整戰略的實施至今已有了三年了（恰好符合當初「三年調整」的提法）。其效果如何？回答有七：1 過去三年的調整雖然成績不小，但仍然需要延至八十年代末，即還要調整八年。（註十）2 積累率（生產性投資）仍然壓不下去。（註十一）3 財政赤字有所下降，但仍然潛伏着深刻的財政危機。（註十二）4 平均物價上漲指數有所下降，但一些與民生直接有關的商品的價格的上漲勢頭不減。（註十三）5 通貨膨脹仍然是一大威脅。（註十三）6 經濟效率仍然不高（以一九八〇年爲例，每百元積累固定資產所創國民收入僅爲廿三元，而一九七八年爲卅四元，一九七九年爲廿九元）。（註十四）7 輕工業總產值迅速上升，重工業總產值不斷下降，以至去年前者超過後者。（註十五）這一現象被譽爲「歷史性的轉變」。

我國當前主要的經濟問題究竟是什麼？是經濟制度（包括計劃體制）弊病太甚還是兩個比例失調？如果是後者的話，這兩個比例失調又是怎樣產生的？是如某些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原因僅僅在於「四人幫」的破壞和華國鋒在「洋躍進」時期的指導思想錯誤，還是有其深刻的制度上的原因？如果我國十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僅僅取決於幾個最高領導人的「指導思想」正確與否，這難道不是說明我國的經濟制度的弊病已經發展到一種十分可怕的地步了嗎？所謂「正確的指導思想」，這裡當然是制定國民經濟戰略和計劃的指導思想。問題在於這種正確的指導思想從何而來？它的產生與現行的經濟制度有什麼內在聯繫？如果一個弊病甚多的經濟體制甚至無法向天才的政策和計劃制定者及時地提供最起碼的準確的經濟信息，後者又怎樣產生他的「正確的指導思想」及其具體的方針政策呢？退一步講，既使政策制定者的指導思想、方針和政策都對頭，人們怎樣指望一個弊病甚多的經濟體制去正確地執行它們呢？

至少在一九七九年年中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的大部份學者認爲當時我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制度過於中央集權化，經濟計劃的制定和執行脫離現實並且不受客觀實際的檢驗和限制（其最重要原因之一是計劃與市場相脫離以及沒有一個靈活的市場機制向計劃制定者和執行者提供及時而準確的信息），以及帶有極大強制性的計劃指標束縛了企業的能動性。正是因爲這些可怕的經濟制度上的弊病，才使錯誤的「指導思想」得以產生並興風作浪，自上而下地得到全面貫徹（如一九五八年的「土躍進」和一九七九年的「洋躍進」）。由此，才會造成兩個比例失調。在這裡，比例失調是結果，是經濟制度弊病嚴重和指導思想錯誤的結果。當然，主觀上意識到比例失調並企圖調整之是一件好事。但問題在於比例失調只是一個抽象的，籠統的概念，更爲重要的是它的質和量的規定性。也就是說，當我們談論積累率太高

時，究竟什麼是「高」？「高」多少？爲什麼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國際條件下，某一個積累率是「高」了？如果要調整，調整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合適（即合乎國情和經濟科學的要求）？爲什麼在我國目前的資源（包括人力和物力）、技術、資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條件下，25% 是一個合適的積累率？爲什麼不是 24.5% 或 25.5%？不少留戀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五三～一九五七）的「黃金時代」的人們指出，當時的積累率爲 25%，一切都不錯。所以 25% 看來是一個較爲合適的積累率。當然，25% 也許並不是一個壞數字。但是，人們是否對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我國經濟發展時期作過深入的、具體的比較、分析和研究？如果沒有，他們有什麼理由認爲八十年代的我國經濟要回過頭走向其五十年代中期的經驗看齊呢？回到五十年代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上去，是我國國民經濟得以擺脫目前國境的出路嗎？

再看農、輕、重的比例。爲什麼去年我國輕工業總產值超過重工業總產值是一個好的「歷史性轉變」？其理論根據和現實根據何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具有完整的國民經濟體制的大國的輕工業總產值可以長期（比如說八年）超過其重工業總產值？如果重工業總產值不斷下降，輕工業靠什麼去進一步擴大再生產？從哪裡獲得新的生產資料？

重工業本身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體系。籠統地講，重工業發展過快並不說明任何問題，正如籠統地講輕工業發展太慢也不說明任何問題。如果整個重工業已處於一種「生產過剩」的狀態之中，爲什麼每年仍然要進口大量的機械設備和其他重工業產品？問題的要害正如不少經濟學家們所早已指出的那樣，與其是說在於重工業的發展速度過快和比重過大，倒不如說是在於重工業的低效、高耗、技術落後，產品成舊以及重工業的計劃管理體制的弊病太多。不言而喻，一定的技術條件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前提之一。但是，更爲重要的是，全面的徹底的改革計劃體制和管理體制，使計劃的制定與執行符合我國的國情和經濟學並使企業獲得進行技術改造、技術革新、提高效率的動力，而不是簡單地以「停、關、併、轉」的辦法來「一刀砍」。與此相似，輕工業總產值的迅速上升也並不意味着「形勢大好」。如果一面擴大輕工業生產，一面有大量的輕工業產品賣不出去，這樣的增產不過是變相的浪費而已。

正確的調整固然取決於正確的指導思想。但是，正確的指導思想來自對客觀形勢的正確認識和正確的分析方法，而對客觀形勢的正確認識有賴於一個較爲合理的經濟體制所提供的，基本正確的經濟信息。綜觀我國大小報刊雜誌，有大量文章論證調整決策之必要、之英明（絕大多數這類文章從不涉及「量的規定性」，即人們

只是談論積累率太「高」，和重工業太「重」，從不研究爲什麼「高」，爲什麼「重」，以及「高」多少和「重」多少），但却很少有文章具體地論證究竟怎樣調整，調整哪一些部門或行業，調整到什麼程度爲佳，哪些部門或行業不但不需要調整，而且要擴大生產，等等。這種現象難道不是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的經濟學家們和政策制定者們至今還沒有一個清楚的、合乎國情和科學的關於調整的具體方案嗎？長此以往，人們憑什麼去指望今後八年的調整能使我國國民經濟拔出惡性循環的泥潭呢？

調整與改革的關係究竟如何，如果不對經濟制度以及政治制度作大幅度的改革，調整會有很大效果嗎？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並不是處於一種靜止不變的狀態之中，而是處於動態的發展過程之中的。如果不對經濟制度作較爲徹底的改革以建立靈活有效的經濟機制去制約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與執行，人們有什麼理由指望比例失調會一去不復返呢？如果不對目前病入膏肓的過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作較爲徹底的改革也能調整出一個「合理」的比例並「保持」下去，那還有什麼必要侈談什麼「將來的進一步改革」呢？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樣，經濟調整戰略的核心並不只是改動一下國民經濟計劃中的積累率與消費的比例和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的比例，而且是重新鞏固和加強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實際上，這種做法與蘇聯在一九六五年的「柯西金改革」失敗之後的做法雷同）。如果這一批戰略能夠貫徹下去並有所成效的話，那麼在可預見的將來，一個蘇聯式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官僚經濟體制也會重新應運而生。至少蘇聯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在那個時候要作全面的、徹底的經濟改革要比現在困難得多。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加強中央集權化的過程中獲得更大權力的官僚們不願意放棄他們的既得利益（當然，蘇聯的經濟改革之所以無所建樹的原因很多，如蘇聯與東歐的關係就是蘇聯經濟改革的重要障礙之一）。

也許人們會爭辯說，我國的經濟改革並沒有完全被放棄，至少在某些領域（如企業管理體制）中，改革還在繼續進行。但是，問題的要害並不在於有沒有某種微觀上的小改小革，而在於這種改革的目的、性質及其所能達到的客觀效果究竟如何？以蘇聯爲例，「柯西金改革」也對企業的管理體制作了不少改革，如改革工資制度、獎金制度、企業利潤留成制度等等。但是，另外一些最關鍵的領域，如價格體制，指令性指標體系，企業的真正的根據市場供求關係作出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的自主權，原、材、燃料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配體制以及企業產品的銷售制度等等，並沒有受到很大觸動。因而，這種改革的性質只是以

物質刺激為手段來促使企業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經濟計劃指標。在這裡，企業的「自主權」和「能動性」只是完成國家下達的指令性指標的「自主權」和「能動性」。另一方面，雖然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因運用電子計算機和「投入—產出」分析法而成為「科學化」，但其基礎仍然不是市場機制，而是長官意志——不受客觀現實和不向人民負責的「科學的」長官意志。國民經濟能否順利發展，仍然取決於幾個最高領導人的「指導思想」的「正確」程度。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弊病，計劃脫離現實，企業沒有充份的自主權以及職工沒有真正的首創精神仍然沒有得到克服。更為重要的是，廣大職工與官僚體制之間的關係毫無改變——仍然是一種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以比較和研究「社會主義」各國經濟制度模式與經濟改革經驗教訓出名的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再三強調，除南斯拉夫之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都是失敗的原因了（匈牙利也許是一個例外）。

經濟調整與農業中的經濟改革的關係如何？經濟調整戰略能否有助於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四大問題之一——農業問題？（註十六）我們在前提已經指出，農業中已經進行的經濟改革的實質是共產黨少「管」或不「管」庄稼漢，即在建立自由市場的基礎上給農民以較大的自主權。這種深受農民歡迎的改革至少在下述幾點上是與經濟調整戰略相矛盾的：第一，經濟調整的基本原則是再度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和加強國家經濟計劃的指令性指標的作用，而農業中的改革却是極度的分權直至個體農戶的自主權。第二，經濟調整戰略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國家加強對市場和物價的控制以緩和物價上漲，而農業經濟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却是發展自由市場。（當國家無力向農村提供足夠的受農民歡迎的輕工業產品和生產資料時，兩個「平行」市場——國家市場與自由市場——的並存是造成物價上漲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經濟調整的另一個重要措施是控制人口增長。然而，在目前的技術和資本的條件下，勞動力仍然是我國農業生產中除土地之外的最重要的生產力要素。再加上農村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養老制度，以刺激生產為目的的農業改革也就成了刺激農村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第四，經濟調整要求加速發展城市輕工業，以更多的輕工業產品向農民換取農產品。但是，農業改革的結果却是農民獲得更大的自由處置自己的剩餘產品和大量發展社隊小工業（這些小工業企業通常是低效高耗技術落後的，但由於價格制度的不合理，却仍然可以「薄利多產多銷」）。其結果，國家計劃部門發覺輕工業計劃和市場受到沖擊，而一些城市輕工業企業開始抱怨原料（來自農業部份）不足之苦。

近一、二年來，我國經濟學界也有一些人開始意識

到我國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把半自給自足的勞動力密集型小農業轉變為商品化程度高，機械化程度高和技術水平高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大農業」。（註十七）過去三年來的農業改革的確以農業管理體制和分配制度上解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問題，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但是，要進一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將勞動力密集型的小農業轉變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大農業」，却還有待於一些具體的技術的和物質的條件得到滿足：資本、農機設備和技術。就我國目前的情況看，農業資金的可能來源有三條途徑：1 國家直接投資。2 國家提高農產品價格以增加農民收入，農民將增加的部份收入用於擴大再生產。3 農民興辦社隊小工業，進行積累，然後對農業追加投資。然而，我國有八億農民。如果全靠增加國家投資來擴大再生產，這在財政上是無法辦到的。就目前而言，國家預算的20%左右是用於農業發展的，但主要是用於建設水利工程，防災救災，國營農場的投資以及發展農業科技；而不是杯水車薪、天女散花式地直接用於個體農戶。第二，雖然近幾年來國家先後兩次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特別是谷物價格），但其提升幅度是有限的。如果要作進一步提高，一則意味着要增加國家財政支出，從而進一步惡化本來已處境不佳的財政狀況。二則意味着普遍物價上漲指數也要隨之上升。此外，隨着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不少與之相關的輕工業產品的價格也會上漲。其結果是農民拿漲了價的農產品換取漲了價的工業品，收益不大。第三，如果國家進一步鼓勵農民興辦小工業，人們會面臨更多的難題：低效高耗的農村小工業將與城市工業（特別是輕工業）爭奪原料、材料、燃料和市場，從而沖擊經濟調整決策中的發展輕工業的計劃；國家控制較鬆的農村小工業產品的價格將沖擊經濟調整決策中的控制市場物價的政策；由於現行價格體制的的不合理性，低效高耗質量相對差的農村小工業產品仍然具有相當強的競爭能力。這種競爭能力將沖擊經濟調整決策中的提高城市工業企業效率的計劃，等等。

這裡有必要簡要地談一下農業經濟改革的前途問題。第一，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農業經濟改革是與在工業管理體制、計劃體制以及價格體制中執行的經濟調整決策背道而馳的。第二，農業經濟改革已經遇到並且將還會遇到愈來愈強的政治阻力：幾百萬農村地區的官僚不斷抱怨經濟改革削弱了他們原有的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軍隊開始發現戰士們想回鄉「致富」。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的農村人民公社制度並不只是一個基層的經濟組織，而且是我國的整個龐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官僚壟斷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一塊基石。如果這塊基石遭到嚴重的破壞，整個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將會面臨一場深刻的危機。另一方面，八億農民的基本要求已經成為

一種強大的政治壓力（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曾經說過，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他們耐心地等待了我們二十年。現在的問題是他們還願意等多長？）。從經濟上看，國家也沒有能力花費更多的外匯去進口糧食。因此，經濟調整戰略與農業經濟改革的矛盾以及農民要求保持和擴大他們的自主權與官僚們希望「收回」他們的特權的鬥爭在可預見的將來會成爲我國農村中的主要矛盾。然而，有一點是人們必須記住的，那就是今天中國的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勢是完全不同於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國的政治形勢與經濟形勢，今天的中國農民也是完全不同於當時的中國農民了。因而，我國的農業改革和農村政策如果再走「回頭路」的話，是極有可能觸發一場政治與經濟危機的。

經濟調整決策與我國外貿領域中已經進行的改革關係如何？經濟調整能否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能否有助於我國引進更多的資本和先進技術？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第一，我國目前的主要貿易伙伴是日本、香港、美國和西歐這些經濟體制完全市場競爭化的國家和地區，而不是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型的蘇聯和東歐各國。除了出口原油其他一些初級產品之外，我國出口產品的重點是勞動力——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工業產品。我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對手不僅有技術水平高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型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以及一些擁有廉價勞動力和製造工業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一些亞洲的國家和地區。凡此種種，都要求我國的外貿體制和經濟體制趨向分權化和靈活化，也要求我國的僵化的計劃價格體系逐步與世界市場上瞬息萬變的價格體系相適應。唯此，才能適應世界市場上的激烈競爭。這也是幾年前改革外貿體制的基本出發點之一。

但是，經濟調整決策的要求却是完全相反：它要求高度的中央集權（特別是集中財權和強化指令性計劃指標對企業的制約作用），其結果將必然削弱我國外貿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註十八）其次，經濟調整決策與發展經濟特區，吸收外資的政策也是相左的。經濟特區內的企業經營的基本上運用西方的管理體制與經商原則。這種體制與原則當然是與特區之外的我國經濟計劃、管理體制和原則完全不同的。如果意識到這種差距和矛盾，以進一步改革的辦法來縮小差距，緩和矛盾，並以特區爲全國範圍的進一步改革的試驗田，特區會愈辦愈大，其特區外企業管理體制的影響也會與日俱增。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回過頭來重新強調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的地位，就會使特區內外的差距擴大，矛盾加深，其結果既不利於特區的進一步發展，也不利於特區外企業吸取特區的經驗。第三，我國現行的價格體制既沒有正確反映市場的供求關係，也沒有精確反映產品的成本和企業的效率。特別重要的是，這種

價格體制沒有與世界市場的價格體系建立直接聯繫。這是我國對外貿易不能很好發展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其結果是進口企業往往贏利而出口企業常常虧損。如果經濟調整不對我國國內價格體制進行重大改革，使國內商品價格逐步接近於國際市場價格並作相應浮動，我國的出口企業會逐步喪失其本來不強的擴大出口的動力，及其在世界市場下的競爭能力。

這裡順便談一下經濟特區的前途問題。至少在下述幾個方面經濟特區的發展是與我國目前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其發展趨勢相抵觸的：1 經濟特區的管理體制是資本主義的。因而特區的成功與特區之外的困境相比較是令人難堪的，而且是與當前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直接相沖突的。2 特區內職工工資一般重超過特區外同類、級職工工資的40%左右。（註十九）這種收入差距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3 特區的進一步發展有賴於它與特區外企業的各方面合作（原料、材料、燃料、部份市場、配套作業，等等）。當特區外的企業在執行經濟調整決策的收縮政策時，上述合作是難以順利進行的。4 特區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也是官方極爲頭痛的一個問題。因此，在最近的將來，特區雖然不會被「砍」掉，但也不會有很大發展。

最後，讓我們看一看實行經濟調整決策的政治條件。不言而喻，經濟調整決策的提出和推行是符合一九七九年春季以來我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遷的，即由「思想解放」變爲「四個堅持」，由支持民主運動到鎮壓民主運動，由鼓吹「政治改革」到力圖重建一個蘇聯式的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制。在這意義上，與其說經濟調整決策是爲將來「進一步改革」作準備，倒不如說它是爲重建蘇聯式的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所邁出的第一步。聯繫到今年五月間北京經濟學界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肯定，對「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批判，以及最近的中蘇「緩和」的進展，問題難道不是很清楚了嗎？

三、幾點結論

（一）將我國基本經濟戰略由經濟改革改爲經濟調整是黨內改革派的政治失敗之一。連同它的政治立場的根本轉變（即由「思想解放」到「四個堅持」及其對民主運動的鎮壓）以及最近對蘇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說明黨內改革派已經基本上拋棄了它三年前所提出的，進行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政治路線。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改革派自己否定了自己。

(二) 就其本質而言，目前的當權者們所推行的政治路線和經濟政策的目的是，企圖在我國重建一個蘇聯式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官僚壟斷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

(三) 三年來的經濟調整決策並沒有取得成功，而且在今後幾年內也不會有很大成功的（如果不是失敗的話）。其基本原因如下：

1 政策制定者自己並不清楚經濟調整的具體的、符合我國當前基本國情和經濟科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因此，政策制定者既提不出一個能說明我國當前經濟問題的正確的理論，也提不出一系列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的政策和措施。

2 造成我國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最重要的客觀原因是我國現行的經濟制度的高度中央集權化，官僚主義化以及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與執行沒有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因此，如果不對現行的經濟計劃體制和管理體制作徹底的改革或改造，反而加強其中央集權化和官僚主義化，是無助於恢復我國國民經濟的「合理比例」的。

3 重建蘇聯式的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為目的的經濟調整措施，將進一步窒息企業的首創精神和降低廣大工人和技術人員在企業和出產過程中的地位。因此，這些措施是無法從根本上提高企業的效率的。

4 經濟調整決策是與農業經濟改革的政策直接相矛盾的。在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下，這種矛盾或衝突發展到一定程度，會導致一場尖銳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

5 經濟調整的措施無助於我國對外經濟關係的發展。

(四) 擺在一切願意思考的人們面前的兩個尖銳問題是：如果經濟調整決策徹底失敗了，我們會面臨一個什麼樣的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勢？在那樣的形勢下，我們應該為自己的祖國做些什麼？！

寫於中共十二大閉幕後
杭州西子湖畔

註 釋

(一) 廖季立：「關於改進我國經濟管理體制問題」《經濟研究》一九七八年十二期，第廿六～卅一頁。

孫連成：「論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自負盛行」《經濟研究》一九七九年十一期，第四十九～五十二頁。

王惠德等：「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筆談」《經濟研究》一九七九年十二期，第廿三～四十一頁

柳隨年：「關於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的探討

」《經濟研究》一九八〇年一期，第三～十頁。

(二) 林凌：「四川兩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與問題」《經濟管理》一九八一年六期，第十六～廿三頁。

「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理論與實踐問題討論會記要」《經濟管理》一九六一年七期，第十七～廿二頁。

(三) 同註(一)。

(四) 杜潤生：「農村工作的歷史性轉變」《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第四頁。

(五) 唐懷：「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加工區看我國經濟特區的幾個問題」《經濟研究》一九八一年六期，第六十二～六十八頁。

方卓芬：「論經濟特區的性質」《經濟研究》一九八一年八期，第五十四～五十八頁。

(六) 同註(一)。

(七) 許條新：「我國當前經濟調整問題」《經濟研究》一九八一年六期，第三～八頁。

王積業、吳凱泰：「狠抓調整、穩定經濟」《經濟研究》一九八一年一期，第三～十頁。

(八) 桂世鏞、周叔蓮：「論經濟調整的目標、階段和措施」《經濟研究》一九八一年六期，第九～十七頁

胡耀邦：「十二大政治報告」

桂世鏞：「論進一步調整的特點與意義」《經濟研究》一九八一年四期，第十～十六頁。

(九) 同註(八)。

(十) 胡耀邦：「十二大政治報告」

(十一) 同註(十)、註(七)。

(十二) 同註(十)。

(十三) 胡耀邦：「十二大政治報告」

許毅：「宏觀控制與綜合財政」《經濟研究》一九八二年一期，第廿六～卅一頁。

(十四) 劉國光、沈立人：「關於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幾個問題」《經濟研究》一九八一年十一期，第三～十二頁。

(十五) 姚依林：「關於一九八二年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草案報導」。

國家統計局：「關於一九八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完成情況的報導」。

(十六) 胡耀邦：「十二大政治報告」。

(十七) 翁永曦等：「對我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一九八一年十一期，第十三～廿二頁。

何桂庭等：「關於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幾個戰略決策」《經濟研究》一九八二年三期，第三～四頁。

(十八) 季崇威：「關於中國吸收外資的能力」《北京週報》一九八二年四月廿六日，第十九～廿二頁。

(十九) 同註(四)。

評胡耀邦總書記八月卅日

對法國議長的談話

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當時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英明領袖」華國鋒爲了替自己出訪西歐各國而做輿論和宣傳上的準備，特地打破了共產黨歷來的傳統，破天荒第一次在北京親自舉行了一個有中外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

也就是在那次記者招待會上，「英明領袖」畢竟知識有限和經驗太少，（因他究竟是靠毛澤東御筆一揮親自圈選的私家接班人，而不是靠真材實學和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上的台。）所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錯誤不少和出了不少「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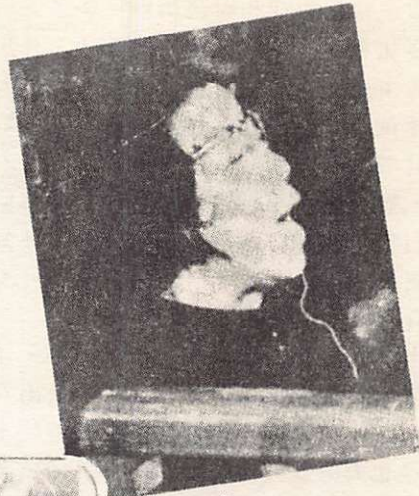
例如，當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肖特問他：『你講過中國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我想問一下，對「四人幫」你們是否打算進行審判以及什麼時候審判？』時，「英明領袖」竟做出了下面使國內人民心灰意懶和使海外輿論大嘩的如下回答：

「我們強調社會主義法制，法律是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因此，在法律面前應該人人平等。」

『「四人幫」所犯的罪行是嚴重的，是一定要清算的。我們將通過法律程序來處理。至於在什麼時間呢？大概不會太久。還可以告訴朋友們，我們對「四人幫」處理時，不會採取他們那種整人的做法。我們對這些人不會判處死刑。他們現在還活得很好。』

當時，「英明領袖」一語既出，當然也就語驚四座。隨後，民刊「探索」編輯部全體成員（除魏京生同志因被非法關在獄中除外。）經討論通過後，立即在西單民主牆上貼出一張大字報，題目爲《評華國鋒總理，十月七日答記者問》。

《探索》批駁和反對華國鋒談話的主要論點，如你既然稱強調社會主義的法制，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謂法律是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並宣告將經過法律程序來處理「四人幫」。那麼，在「四人幫」還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的程序處理之前，你就宣佈了事先早已做出的最後判決的決定——即不會判處他們的死刑；這種明目張胆地目中無法和「老子說了算，我的話就代表了法」的違反司法獨立和審判獨立不受任何人干擾的原則的反民主做法，是在踐踏或是在強調社會主義法治呢？而且「四人幫」既然罪行很嚴重，根據正常的法律程序來審判之後，按其罪行多寡、輕重來定奪治罪，該關就關，該殺就殺，這樣才能稱得上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使全國人民相信如今執行的真正是社會主義的法制，從而才能樹立起法治的觀念和對其有信心起來。可是既稱罪行昭著，但又未經審判就宣佈了其最後的形態，那豈不是對謂要通過法律程序來處理之說自相矛盾而難圓其說？更何況華國鋒是以政府總理的身份在說話，



那就更不應該以政代法或以黨代法來公開破壞和踐踏法律。

華國鋒當年的這種荒唐和愚笨的做法，追根查源，不外有三：一由於多年來在我們的國家根本就沒有樹立任何法治觀念，所以無論是小小老百姓，或還是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的頭腦裡，也就根本沒有任何要執

行或遵守法律的概念；二長期以來由於在我國各級領導人的頭腦中，總是認為黨高於一切和黨比國或法大；因此辦事總是憑長官意志去主觀武斷甚至獨裁地隨心所欲；而華當時集大權於一身，正值權力膨脹頭腦發昏；再加上他完全繼承了從毛澤東那裡學來的「寡即天下」和「我的話即是王法」的封建和獨裁的做法，所以也就

難怪他會以己言代法律和視法治為兒戲了；三在現階段我國有許多領導人，常常以沒有文化的工農出身的「大老粗」自居；並不以為耻而反以為榮。這些人完全忘記了導師列寧的「沒有文化是不可能戰勝敵人和取得最後勝利」的教導。因而完全是憑擺資格、吃老本，或靠吹、拍、捧、爬、拉等不正當手段身居要職來佔着茅坑不拉屎或實行其封建和獨裁的領導。這些人連知識和文化都沒有，更何來法治觀點？而華國鋒，也可說是這方面的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正是由於華國鋒水平有限和根基太淺，才使得他在歷史的政治舞台上曇花一現，很快地退出和消失了。想不到無獨有偶的是三年後的今天，在地位上取而代之華國鋒同樣也大權在握的胡耀邦，都在走當年華國鋒所走過的「老路」和犯着與華相同的錯誤。

例如，今年八月卅一日當胡耀邦會見法國議長時竟聲稱：「四人幫」的首惡份子江青現雖然關在監獄裡，但她表現惡劣，一絲一毫都沒有悔改之意。隨後他又補充說：當明年一月廿五日江青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期限到了時，江青不但不會被按法律來執行槍決處以死刑；而且還可能獲得減刑的待遇。

胡耀邦又一次把國法踩在腳下踐踏的做法，充分暴露和論證了今天在我們國家裡根本沒有真正的法律。而既無真正的法律，又何來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治？又哪能談得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

按照真正的法律來辦事，首先就要做到司法公正和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團體、政黨、個人和政府的干擾和影響。那麼，江青的刑期到了之後，她該殺還是不該殺，應該根據全國人大通過的刑法來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來處理，而胡耀邦不管是代表他個人或是代表他所屬的那個政黨，按照法律是不應該而且也沒有資格在這件事情上插手或干涉的！

其次，江青該殺不該殺，應該在她的刑期到了之後，由司法部門按照她罪行的大小和她在獄中的具體表現來量刑法；而不應該由既不能代表司法部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也不屬於全國人大和在政府任何部門中任職的胡耀邦來決定和執法！更何況根據法律他沒有資格和任何權力這樣做！

還有，江青該殺不該殺，根據歷史的慣例和現在執行的新刑法，如果她在獄中表現很好，有悔改和立功贖罪之意，那麼，按照法律不僅不應該實行死刑；而且還應該酌減少她的徒刑。這樣做才能真正做到執法如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不因她是「四人幫」中的首惡，她有所悔改之意而不對她寬大和減刑。相反，胡耀邦既稱江青在獄中表現很差沒有一絲一毫的悔改之意，那又憑什麼理由和根據那一條法律，來宣稱不僅不會對江青執行死刑；而且還要對她減刑呢？

按照胡耀邦的邏輯，那如今在全國監獄中所有的被

判處死刑而緩期兩年執行的犯人，是不是也都應該不僅不執行死刑；而且還都應該獲得減刑呢？如果不，哪又是為什麼呢？更何況這些判死緩兩年的犯人的罪行遠遠不及江青的大；而且他們的表現也起碼要比江青好。還有以往被判處死緩兩年而被執行槍決死去的人，是不是也應該為他們「昭雪平反」呢？

當年判處江青的死刑而緩期兩年執行，審判江青的特別法庭的理由是給他一個悔改的機會以觀後效。一年多來，全國人民並沒有忘記這件事；因這件事將檢驗在我們的國家究竟是不是法治或還是黨治或人治；這事也將論證我們新制定出來的法律是否威嚴有效或還是一紙空文；同時這事也將使全國人民清楚地看到在我們這個號稱執行社會主義法治的國家裡，是否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令人感到悲觀和失望的，是胡耀邦這次踐踏法律的做法，已經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當前在我們國家裡根本沒有法治而仍然是黨治和人治。

建國卅餘年來慘痛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靠黨治和人治是治理不好我們國家的！而我們的國家要想走上正軌和前進，就必須依靠法治！在這裡不得不指出的是：胡耀邦作為一個領導有近四千萬黨員的執政黨和最高領導人，尚切如此地不僅頭腦中根本沒有半點法治的觀念；而且還掉頭不遵守和破壞踐踏法律，以及說話是這樣地不負責任，領導工作的水平是如此的低落；那下面更多的領導人就更可想而知了。照此下去，我們的國家怎麼會搞得更好？我們國家的希望又在哪裡？

最後，我希望胡耀邦不要生氣，我還要對他提出兩點建議：

一建議胡耀邦應以「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的高尚胸懷，向華國鋒同志學習，把自己能力不能勝任擔當的最高領導人職位讓給年富力強和知識豐富以及一心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同志；然後自己應到中央黨校再去認真讀一下馬列的書。

二建議開辦一個專為中央領導同志而設的法律知識學習班，由胡總書記任班長。因為對領導着中國的領導人來說，需要學習專業技術知識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因年紀太大學了也沒多大作用更何況根本就學不進去。）；而知道和理解最起碼的法律常識，對他們來講則是非常迫切和必需的！因他們現在畢竟還在宣稱要帶領着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去實現「四個現代化」和跨入二〇〇〇年。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廣州

註：借引用毛澤東的話，見《毛選》第二卷第三四九頁，《反對自由主義》一文，看看胡耀邦總書記是不是言行一致地真正做到「四個堅持」。

王炳章博士舉行 《中國之春》 首次新聞發佈會

本刊記者 金林

《中國之春》發言人王炳章博士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在美國紐約希爾頓旅館五二四房間舉行了《中國之春》首次新聞發佈會及記者招待會。舉行招待會的通知從十六日晚陸續發給各通訊社及報紙，《美聯社》在十六日接到通知後，立即向有關新聞機構發佈了消息，接到通知及《美聯社》消息而參加記者招待會的有《美洲華僑日報》、《中報》、《北美日報》、《中國時報》、《華語快報》、《紐約時報》、美國《時代周刊》、《路透社》、《中央社》、等機構的中西記者。《新華社》駐紐約分社接到了通知，但未派記者出席。

記者招待會歷時約一小時十五分鐘。首先，王炳章博士以《中國之春》首席發言人身份宣佈了兩件事情：一中國當代民主運動並沒有倒下去，她將以更加成熟的姿態重現中國和世界政治舞台。中國民主運動新的喉舌——《中國之春》雜誌即將創刊發行；二王炳章博士本人決定棄醫從

運，即放棄醫學生涯，專職從事中國民主運動。之後，王炳章對這兩項宣佈進行了解釋。最後，他回答了中西記者提出的問題。在會上，王炳章博士散發了下述文件：《中國之春》發刊詞；《中國之春》創刊號目錄（中英文）；《中國之春》通訊處及王炳章博士個人棄醫從運宣言（中英文）。

整個招待會井然有序，氣氛和諧。

在會上，王炳章博士說明了《中國之春》是將民主運動引向海外，使國內國外民主運動配合起來，將民運推向一個新階段。

在談到他個人《棄醫從運》的決定時，王炳章解釋到，醫學只能救治少數病人，不能救國救民。

在會上，王炳章博士特別談到了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及特殊性。他批評了大陸及台灣政權都缺乏民主與法治。他指出，如果說大陸是一黨專政，台灣則是一黨獨大。他談到中國統一問題、香港前途問題及海外僑胞的問題。他說，唯有在中國徹底實行民主與法治，自由與人權，這些問題都會逐步解決。

王炳章嚴肅指出；直接參與《中國之春》的人，都是中國大陸來到北美的留學生，都持有中國護照，不放棄中國國籍。他說：「我們的行動，完全不同於胡娜的政治庇護，也不同於周令飛、吳榮根的「投奔自由」。我們從事的是民主運動，是改造中國的運動。」

最後，在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王炳章強調，《中國之春》堅決持獨立立場。《中國之春》要反對的，不是哪一個政黨，而是封建專制制度及官僚特權階級。在財政上，《中國之春》不接受任何政府及政黨的經濟援助，但他呼籲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民間團體、組織、社區及個人，給予《中國之春》人力、物力、智力及財力方面的援助。



本刊發言人王炳章博士在紐約宣佈創辦《中國之春》

王猷章新學士

《春之園中》

首大濶閱發齋會

注因園中事發難專，番生學醫業賦明，兼
丁行蘇前官與西中丁答回
開始出與春園西中丁答回
將文擬不了靈通士猷章王，士會
除《春之園中》；國詩發《春之園中》
照前《春之園中》；（文英中）發日報供
英中）言宣蘇發醫業士猷章王

為了祖國的春天

——弃醫从運宣言

當年誦醫通天河，晒經石旁誦「離」歌。
如今償愿闯西域，自古難阻向東波。

拿個博士卮卮志，卧薪三載為報國。
蛟龍歸海騰巨浪，莫喪經书刺传说。

這是1982年6月題在我博士論文扉頁的序言詩。這首小詩，
就是我決意放弃醫學生涯，从事民主運動的宣言。它總結了我前
一學的人生歷程，表達了立志報國的意願，也隱晦闡明了「弃
醫从運」決定產生的背景、動機及過程。

我是一名中國醫生，畢業于北京醫學院。在校時參加文革，當
過紅衛兵頭頭，後覺上當而隱退。畢業後，以「老九」放逐于青藏
高原。在通天河畔，唐僧當年西天取經的晒經石旁，慕玄奘
出國學經之胆略，抒屈原「離騷」忧國之情懷。後調回內地，
苦修醫術，夢想以醫報國。1978年，我考取第一批公費留學。1979
年上半年，出國集訓期間，西單民主牆運動蓬勃興起，給祖國
帶來了初春氣息。當時，我是運動的參加者。然而，魏京生的突然
被捕，震撼了我們的心灵，使我陷于深沉的思考之中。出國前，父
老鄉親千叮萬囑，讓我牢記「黃河九曲，終向東流」。志同道合

的朋友们，语重心长地嘱托：“在国内，你已在医学界崭露头角。今天，你飞出了牢笼，你的抱负不应再受到这点名誉的束缚。在民族需要时，你应成为一个医学挽留不住的人。”

我背负着这些寄托，于1979年10月，留学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及蒙特利尔临床医学研究所。1980年元月注册为研究生，1982年9月，获得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实验医学优秀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了，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一些好心的朋友叫我衣锦还乡，甚至对我封官许愿。也有热心的朋友劝我留居北美，安居乐业，甚至愿作具体安排。可是，这些朋友，怎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呢？对我来说，拿个博士，仅为屈辱壮志，卧薪三载，志在报国报民。近三年来，身在异国他乡，心懷神叨故園。站在聖·勞倫斯河边，望着自古东去的流水，就想起文老親朋的嘱托。博士課程的繁重，未挤掉我对民運问题的研究，醫學實驗的興趣，未減少我对祖国形勢的关注。出國後不久，即傳來对魏京生的审判；去年年中，又驚聞王希哲的被捕。覺醒一代的責任感告訴我，“醫學挽留不住”我的時候來到了。在考取留学那一天就开始運籌的報國大略，终于随着博士論文的完稿而漸趨成熟。在論文序言詩中，我以蛟龍東歸、志在除舊布新而翻江倒海的氣魄为勉勵；以唐僧返里，忘記恩人嘱托而喪失經书的傳說為借鑒。我，絕不可忘記大家的叮囑，毅然

作出決定：放棄醫學生涯，獻身民主運動。

當初，從事醫道，乃為父母推動下的個人所好。而今，成為一個民主運動的活動家，是新興的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需要。從此，我將放下我心愛的臨床家的聽診器，帶上社會觀察家的聽診器，去診斷中國社會的惡患痼疾；我將放下我心愛的外科醫師的手術刀，操起社會改革者的手術刀，去割除危害中國社會的膿瘡毒瘤。這，是一條荊棘滿佈的艱苦之路，但是一條光明的路，希望的路。

為表達自己對中國當代民運先驅者的敬仰，決定今後起用王驚蟄的筆名。驚，魏京生京字諧音；蟄，王希哲哲字諧音。我願化驚蟄之雷，劈碎专制制度，開創民主自由。驚蟄之後，就是春分了，祖國的春天一定是美麗的。

我對治病救人，施行人道的醫學仍有無限的依戀，待祖國滿園春色之時，請允許我重返醫壇。

王希章

1982年11月於北美

CHINA SPRING

Table of Contents

Vol. 1 No.1

December 1982

Founding Statement-----Board of Editors

The process of founding the magazine, its principles and purposes. Although the democracy movement within China has been suppressed, it is not dead. China Spring speaks for the resurgence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for democracy, for freedom, for human rights, and for rule by law.

Statement to Chinese Within China and Abroad-----Board of Editors

A simple statement about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oday, pointing out the gravity of the situation and pointing out that the causes are the lack of democracy and rule by law. The article also analyses the Taiwan question, the question of unification, the question of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and the desire of overseas Chinese to return to China to live but their fear of doing so. These problems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article calls on Chinese within China, overseas students, and overseas Chinese to unite together to strugg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by law.

China's Contemporary Democracy Movement: A Remembrance and Self-Criticism-----Record of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Huang Li, Wang Jingzhe, compilers

Participants felt that China's contemporary democracy move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1) Li-yi-zhe's Big Character Poster (1974) 2) The Tiananmen Square April 5th Incident (1976) 3) The Xidan Democracy Wall and the unofficial magazines (1978) 4) The college students' elections (1980) 5) China Spring's preparations. The first four stages can be seen as a spontaneous period. The Board of Editors recalls the background, form, and significance of each movement. The emphasis is on self-criticism and the lessons

to be learned. The Board of Editors feels that the appearance of China Spring signals that the contemporary democracy movement has entered into a period of self-awareness.

Can China's Economic Readjustment Succeed?-----Guan Weihong, Editor from
Within China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economic policy before and after the 12th Party Congress and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within China, the writer concludes that China's resolution to follow a strategy of economic readjustment will lead to failure.

Evalua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Hu Yaobang's August 30th Discussion with the French Spokesman-----Liu Yan, Editor from Within China

A comparison of Hu Yaobang and Hua Guofeng's discussion of the case of the Gang of Four.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China's current leaders still have no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oday, personal and party control are greater than legal control.

"For the Spring of the Motherland"-- Decision to Give up Medicine and Join the Movement"-----Wang Pin-chang

Simple Introduction of Honorary Editors-----Reference Room of the
Magazine

China Spring Board of Editors Resolution #1-----Board of Editors
Decision to give Wei Jingsheng, Wang Xizhe, and sixteen other pioneers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founders of unofficial magazines who are still in prison the position of honorary editors. The resolution also establishes Li Ling as Chief Editor, Huang Li as Executive Chief Editor, and 12 others as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Editors. Of these, 6 are from within China and 6 are overseas students.

名譽編輯簡介 (一)

◆本刊資料室◆

劉青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被捕，八〇年七月被判在陝西省勞改營服役三年。劉青現年三十五歲。六五年前在北京唸書，後到山西省曲沃插隊務農。七三年以工農兵學員身份就讀土建科，七七年畢業後在陝西省為機械工人。七八年底加入民主運動，創辦《四五論壇》。曾兩次被推舉為北京幾份民刊「聯席會議」的總召集人。因印發魏京生案件審訊過程的錄音帶記錄稿，而被北京市公安局拘押，不經審判而判勞改。在勞改中，他寫成獄中手記《沮喪的回顧與前瞻——我向社會法庭控告……》。此書轟動西方世界。劉青被捕後，全國十六份民刊組成「營救劉青全國委員會」，成為各地民刊更密切聯繫和組成全國民刊協會的前奏。

王希哲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被捕。八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被判十四年徒刑。王希哲現年三十四歲，四川人。已婚。文革時參加紅衛兵運動，六八年下放廣東英德，一年後回廣州，在魚肝油廠當焗爐工。七四年因系《李一哲大字報》執筆，被指控為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關押起來。七六年被正式判刑，七八年獲釋。隨即投入了民主運動，主編《學友通訊》，共出版了十三期。

傅申奇



一九八一年四月中旬被捕，于八二年初被秘密審判。傅申奇現年二十八歲，上海人。六八年就讀上海工藝中學，七二年進上海動力機廠當工人。七八年投身民主運動，同年十一月發起組織《振興社》，七九年十一月創刊《民主之聲》，同時加入「上海青年經濟研究會」。八〇年十月全國民協成立，協會會刊《責任》從第三期起由傅主編，並且改為半月刊，傅出版《民主之聲》共十五期。

魏京生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被捕，同年十月十六日被判十五年徒刑。八〇年七月仍被單獨囚于北京第一監獄的死牢中，魏京生現年三十二歲，安徽人。六六年唸初中最後一年，參加了紅衛兵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後被關押。六九年參軍，七三年復員後在北京動物園當電工。七八年十二月在民主牆貼出《第五個現代化》大字報。七九年一月創刊《探索》，該刊大部份文章由他執筆，筆名有金生、金聲。魏于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抨擊鄧小平的獨裁傾向，四天後被捕。

徐文立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被捕，之後無音訊。徐文立現年三十九歲，已婚。六三年高中畢業後參軍，復員後在北京鐵路局工作，當電器修理工。七八年十一月，他將自己主辦的《四五報》與《人民論壇》合併，組成《四五論壇》。

八〇年三月在官方壓力下被迫停刊。徐仍出版《學習通訊》、《時代》、《人》。當波蘭「團結工會」的群眾運動風起雲湧時，徐曾親自給工會主席華里沙發了一封公開信，表示支持。八一年四月五日，來自全國各地民運數百名積極份子集中北京，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紀念「四五運動」五周年，十日深夜，北京公安人員闖入徐家將他戴上手銬押走，從此下落不明。

(待續)

《中國之春》 編輯部第一號決議

一、爲紀念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戰士，銘記他們光榮的鬥爭業蹟，編輯部決定，授予下列曾經被捕，甚至尚在獄中的，知名的民刊創辦先驅者，爲名譽編輯。

魏京生	原北京《探索》主編
王希哲	原廣州《學友通訊》主編
傅申奇	原上海《民主之聲》及全國民刊協辦會會刊 《責任》主編
劉青	原北京《四五論壇》編輯
徐文立	原北京《四五論壇》主編
楊立青	原北京《四五論壇》主編
陳爾晉	原北京《四五論壇》編輯
何求	原廣州《人民之路》主編
任曉町	原北京《中國人權》主編
孫豐	原青島《海浪花》主編
張京生	原長沙《共和報》主編
劉力平	原長沙《理想通訊》主編
秦永敏	原武漢《鐘聲》主編
鍾粵秋	原韶關《庶聲》主編
王潭源	原天津《評論》主編
楊在引	原貴州《啟蒙社》主編
鄭玉林	原溫州《吶喊》主編
王榮清	原杭州《之江》

二、編輯部向其他大批民運先鋒戰士，如陳旅、張文合、胡安寧、郭樹章、王一飛、路林、陶森、徐水良、陳西明、邢大崑、彭光忠、劉二安、朱建斌等，致以崇高的敬意。

三、編輯部名單：

主編：	李林（中國留學生）
執行主編：	黃立（中國留學生）
編輯：	關微宏（國內）
	董旭生（國內）
	劉燕（國內）
	趙小青（國內）
	聶冀生（國內）
	盛桁（國內）
	王驚蟄（中國留學生）
	武煒（中國留學生）
	邱玲玲（中國留學生）
	周志仁（中國留學生）